

中英印三語合璧的語言教材

——《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藏本考與價值重估*

王澤偉**

摘要

《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出版於英國占據舟山時期，是一部博廣且專業的詞彙教材。在本文之前的寥寥數筆研究，多惑於書籍的表象，集中探討該書呈現的文化意涵或是首創價值，而缺乏對該書最大學術價值的語音系統予以深入探討，致使該文獻的研究至今備受冷落。該書作為吳語區最早的英文教材，開創了印度泰盧固文注音寧波方言系統，具有獨一無二的記載鴉片戰爭時期寧波方言語音的價值。由是，本文不僅僅對該書藏本與書籍史作了相關考證，更是對部分泰盧固文進行轉寫，可發現其具備驗證近代以來寧波方言語音演變與填補空白的不可或缺的價值。職是之故，《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的學術價值亟待重新評估，而在中西交流史中的意義與價值也應當被承認並得到充分的討論。

關鍵詞：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舟山、寧波方言、泰盧固文、英文教材

2023年9月26日收稿，2024年4月11日修訂完成，2024年4月29日通過刊登。

* 本文蒙導師張宏生教授指導，又蒙審查委員細緻審閱，並提供寶貴修改意見，謹此特申謝忱。此外，本文在蒐集諸多珍稀資料與獲取版權的過程中，蒙中國國家圖書館、大英圖書館、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杜倫大學綠宮圖書館、羅格斯大學東亞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澳洲國家圖書館各工作人員的多方協助，亦蒙同儕孔燕君、李倩提供建設性意見，一併致謝。

** 作者係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 言

針對洋涇浜英語教材之研究，是近年來語言、歷史與翻譯學界的研究熱點。寧波是繼廣東、福建之後，近代西方人研究方言、編寫英語教材的嚆矢地區，它不僅在時間上早於上海，且成就斐然。但寧波與粵、閩二省狀況不同是，單從肇端而論，其英文教材開創者的身分乃英國殖民軍政府下屬印度籍官員，且早於新教傳教士，實屬罕見。¹ 今人若不熟悉寧波近代史，則多會認為《南京條約》簽訂後，五口通商，寧波開埠（1844.1.1），洋人才隨之而來，而實際上寧波在鴉片戰爭期間曾長期陷落於英軍，早在開埠前便已具使用英語的條件。隨即，1843 年英國在寧波設領事館，羅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為首任領事，而其出版之《正音撮要》（*The Chinese Speaker*, 簡稱《撮要》）自然挾其身分，備受學界關注。然而，羅氏之書的獨特性在於方言洋涇浜英語盛行之年代，慧眼獨具地以官話編寫英文教材。而鮮有人知的是，在羅氏之先數月，尚有一部寧波方言的英文詞彙教材在寧波舟山出版——《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簡稱《雜字文》），拉開了吳語—英語類洋涇浜教材編寫的序幕。² 只可惜該書限於

1 不可否認，稍晚以後，諸如以丁韞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為代表之美國長老會傳教士（Board of Foreign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844 年開闢寧波傳教區，1845 年成立「長老會寧波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of Ningpo〕）方才是寧波方言研究的主力軍。他們不僅創造了寧波方言的羅馬字注音體系和漢字拼寫系統，更藉寧波華花聖經書房（Chinese and American Sacred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 1845-1860）出版了相當數量之專著，以致寧波方言的羅馬字拼音成為該書房的特有出版物（蘇精基於姜別利〔William Gamble, 1830-1886〕之報告統計出約有 42 種，田力則在熊月之的基礎上依寧波差會原始檔案增補至 52 種並列明印刷量），甚至還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口語考核形式，以及在教會學校推行寧波土話的羅馬拼音教學以取代中國文字教學，可參趙力與蘇精之研究，寧波方言出版物具體書目可參田力之〈羅馬字母拼寫寧波方言著作（迄於 1859 年）〉節。趙力，〈「外邦人的唇舌」：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的寧波口語學習（1844-1911）〉，《清史研究》2018.3(2018.6): 50-61；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307、350、417-420；田力，「寧波長老會寧波差會在浙東地區早期活動研究（1844-1868）」（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論文，2012），頁 38-47、116-121、215。

2 如游汝杰在研究第一部粵方言課本時提出，漢語各大方言最早課本都是由傳教士編

作者的默默無聞，至今未受重視。

《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1846年5月出版於浙江寧波府的舟山定海，³ 作者是來自東印度公司治下的印度（Company rule in India）馬德拉斯省（Madras）⁴ 的隨軍學者仙尼華四（P. Streenevassa Pillay, ?-?）。有關此書，目前學界僅陳璇、郭紅、徐春偉與田力有專文討論，尚有大篇幅開拓空間。⁵ 該著最為獨到之處，乃由中（甬方言）—英—印（泰盧固

寫，且吳語最早教材為1850年秦右（Benjamin Jenkins, 1815-1871）的《上海土話功課》（*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實際上，《雜字文》才是最早的吳語教材，只是通過泰盧固語來進行擬音。按此，粵（裨治文〔E. C. Bridgman, 1801-1861〕的《廣東土話文選》〔*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1841〕）、閩（璘為仁〔William Dean, 1899-1981〕的《潮汕土話初階》〔*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 1841〕）、吳三大方言區，即最早的通商區域，西人編寫的方言教材都在1840年代（即鴉片戰爭前後）產生。游氏早年在《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中，在首章〈序說：收藏〉節中的大英圖書館項，特以《雜字文》為例說明其饋藏之豐，以及在〈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考錄：方言詞彙、詞典〉之「吳語：寧波」項中已經提及《雜字文》，標注由大英圖書館所藏，並進行了簡要的介紹。然他誤以為泰盧固語為梵文，依照中文序誤作者仙尼華四為久居舟山的梵僧。據〈序說〉，該書需要憑介紹信方能入內閱讀，推測游氏未見全書，未接觸英文序言，難免有此疏失。2021年，游氏出版增訂本，略作修訂，刪去了梵僧之說，改為印度馬德拉斯的有名學者，但依舊誤泰盧固語為梵文。游汝杰，《方言接觸論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頁239-242；氏著，《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頁10、135-136；氏著，《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增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頁17、180-181。

- 3 定海雖於1841年升格為直隸廳，但在英國人筆下，依舊視其為隸屬於寧波府的縣。且定海即便升格，依舊受寧波道台（寧紹台道）管轄。
- 4 馬德拉斯位於印度次大陸的東南部，緊靠孟加拉灣西部，它與加爾各答一道是英國早期實施殖民統治的軍事重鎮。十九世紀初，馬德拉斯轄區擴張吸引了大量具備文化修養、能講泰米爾語與泰盧固語的婆羅門來到馬德拉斯，在新的政府部門與新的教育機構尋求職務。此便解釋了仙氏可以來到舟山並編纂《雜字文》的前提條件之一，即出自遠征東亞的軍事重鎮與文化氛圍濃厚且高種姓聚居的馬德拉斯地區的雙重地緣因素。（英）貝利（C. A. Bayly）著，段金生、蔣正虎譯，《新編劍橋印度史：印度社會與英帝國的形成本》（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5），頁71-72。
- 5 郭紅，〈第一本寧波方言英漢詞彙集——《英華仙尼四雜字文》〉，《或問》15(2008): 21-28；陳璇，〈《英華仙尼四雜字文》中近代舟山地域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大學學

語⁶) 三語合編，其中泰盧固文僅用以標注甬方言讀音，而非詞彙對譯。職是之故，其最重要的記錄語音價值受限於陌生的泰盧固文而被擱置——藉助泰盧固文的拉丁字母轉寫，可以還原鴉片戰爭時期寧波方言的語音，使得針對寧波方言研究中，近代語音演變的某些猜測，就此有了確鑿證據，並可對傳教士未曾記錄的語音予以補足。進而論之，對《雜字文》的研究如果過分關注漢語詞彙，或因語言能力問題迴避泰盧固文，則容易在帝國研究中陷入漢族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從而遮蔽了泰盧固語可帶來漢學研究之印度相關的新議題與新發現。過往語言學與翻譯研究，多重視文本內容的探討，故在此基礎上本文一併對書籍的周邊信息加以補足，針對書中出現的作者有關的印度背景、致謝中的人物等，以及，書籍的流轉作一細緻考據，以展示《雜字文》多元的研究面向、開拓價值與基本的學術定位。

簡言之，為重估《雜字文》的學術價值，為該文獻正名，本文重點從書籍史、出版史與注音系統為主要角度切入，以記錄語音價值為核心價值，其餘為考證為拓展價值。一部語言教材之珍稀並非意味著可貴，本文意在著重證明《雜字文》不僅在數量上稀見，且內容上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在揭開泰盧固文的神祕面紗後，《雜字文》可供成為寧波方言研究新武器，使其不受寶珠蒙塵之憾。同時，本研究涉及的部分十九世紀教材雖然已經電子化，但書籍物質性部分還需要藉助實物方能確定，此為藉助電子化書籍研究時需要留意之處，如大英圖書館藏本電子化時缺漏了第 1b 與 2a 頁的內容。⁷ 於是，本文藉助歐美多個圖書館的幫助而獲得了一手資料，以提供一些出版史方面的新見。

報(人文科學版)》37.1(2020.2): 32-37; 徐春偉,〈《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英軍占領舟山的書證〉,「澎湃新聞·翻書黨」網站,2017.6.2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07893 (2022.9.18 上網檢索); 田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所反映的寧波文化〉,《寧波晚報》2021.1.17, A07 版。

- 6 泰盧固語(Telugu),屬於達羅毘荼語系(Dravida),如今主要分布在印度南部地區。
- 7 大英圖書館藏本《雜字文》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但本文之研究涉及書籍史等議題,未來進一步還將涉及副文本等面向,故而以古籍原本為底本。同時,因谷歌圖書公開之電子版與浙江古籍出版社版均源自大英圖書館藏本,所以二者皆缺

二、「遲到」百年的教材：《雜字文》藏本現狀與書籍史

寧波本就是中英接觸的前沿陣地，早在十八世紀初東印度公司便已長期駐紮於此——1699年東印度公司試圖在寧波建立商館，派遣主任與管理會來料理在華業務，第一任主任喀恰浦（Allen Catchpole, ?-?）還獲英王委任作為駐華總領事，舟山在十七、十八世紀遂成為了東印度公司在華的貿易中心。直至1757年乾隆諭旨禁止洋船再赴寧波，開啟廣州一口通商時代，致使甬英交往一度中斷，後來方有馬戛爾尼使團（Macartney Embassy）訪華時提出再次開放寧波供英人通商，並要求給予舟山附近一島供英人居留的要求。八十餘年後，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序幕由舟山陷落拉開序幕，隨後在1840至1846年6月之間長期由英國設立之軍政府管轄並曾派遣總督。在英語文獻中，大多將該時期舟山稱為准殖民地（quasi-colony）或第一塊英人統治的中國領土，羅伯特·尼爾得（Robert Nield）更是直言：「舟山從來不是什麼通商口岸，而幾乎是一個殖民地。」⁸

從清代甬英交匯的大歷史背景下，可再一步追尋英語在寧波使用的小歷史。雍正年刻梓之《浙江通志》載，康熙年間寧波府設海關十五處，

漏了12個詞彙。現據大英圖書館藏本與羅格斯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本依序補齊：信佛（Piety）、謗佛（The Blasphemy）、罪過（Sin）、父過（Original Sin）、委屈（The Destiny or Fait）、地獄（Hell）、念佛（Penitence or Penance）、仙人（A Seer）、和尚（An Ascetic: A Monk/A Friar）、囚徒（The Damned）、氣（A Ghost）、活（A Spirit）。寧波市檔案館、鎮海區檔案館，《寧波方言文獻集成：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 & 英話注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此處，承大英圖書館中文館藏部 Emma Harrison 館員與羅格斯大學東亞圖書館楊濤先生提供的幫助，在此特申謝悃。

- 8 以上歷史主要參考田力，准殖民地等觀點來自尼爾得，乾隆旨意見《國朝柔遠記》。另外，〈舟山的第一塊英國定居地〉（“The First English Settlement in Chusan”）注釋道，喀恰浦雖為領事，但實際上無領事權力。田力，《早期中英關係史：以浙江為中心的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頁3-4、64；清·王之春，《國朝柔遠記》（長沙：嶽麓書社，2010），頁229-231；Robert Nield, *China's Foreign Places: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Treaty Port Era, 1840-194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80-82; Demetrius Boulger, ed., “The First English Settlement in Chusan,” *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3 (1887): 294.

並有新設一處定海紅毛館，⁹專供與洋人通商之用。該口隸屬寧波府定海縣，乃是奉康熙旨意，因應海外番船源源而來所設立。雖名為「紅毛館」，但不局限「紅毛」一國來通商。所謂之「紅毛」，對於浙江而言，已非早時廣州言說的葡萄牙人，而是指「英圭黎國」（英國），且時人多少知道英國的基本信息。¹⁰「英語課」或許在十八世紀初東印度公司與寧波交易的時刻已經開展了，寧波商人與東印度公司貿易必得有語言交流。1699年，喀恰浦帶著貿易使命出發時，商隊中的中文翻譯是與臺灣貿易中掌握中文的所羅門·洛伊德（Solomon Loyd, ?-?），並推測其所操口音多為閩南語。¹¹不久，喀恰浦抱怨定海鎮總兵藍理（1647-1719）顛預霸道，在談判過程中不允許其自由聘用商隊中的語言學家（如洛伊德），而是必須接受由其提供的人選。¹²爾後，《浙江通志》記載康熙三十九年（1700）定海浙海關六月抵達的兩艘英國船，船主名未氏羅夫、未里氏，八月所到盧咖喇船一艘，以及九月飛利氏船一隻，是用寧波地區以漢字直音法記錄英語語音的書證。¹³至晚在 1750-60 年代，馬戛爾尼使團以確切的文字記錄定海商人能夠言說英文，¹⁴但就目前之文獻而言，當時應當沒有語言教材誕生。

9 喀恰浦將管理會（Council）設在離城南不遠的海濱，以英式風格修築，築有碼頭，方便公司船隻停靠，島上當地居民稱之為「紅毛館」。後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1841年），欽差大臣裕謙（1793-1841）全行拆毀「紅毛道頭」與「夷館基地」。Liam D'Arcy-Brown, *Chusan: The Forgotten Story of Britain's First Chinese Island* (Kenilworth, UK: Brandram, 2012), 2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 293。

10 「按：紅毛即英圭黎國……」詳參：清·嵇曾筠等監修，清·沈翼機等編纂，《浙江通志（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2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284、296-297。

11 D'Arcy-Brown, *Chusan*, 21.

12 Ibid., 25.

13 清·嵇曾筠等，《浙江通志（三）》，頁 297。

14 學界普遍關注的是「廣州英語」，對於清代中期寧波地區是否有人簡單掌握英語，鮮有論及。其實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 1737-1801）《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記錄 1793 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一事中，對寧波人能說英文有所記載。書中記錄到斯當東乘坐的克拉倫斯（Clarence）號在舟山登陸，進入內港後，停泊在距離曾經的紅毛館半英里之處。隨即有官員前來問詢，隨行的還有一位翻譯。這位老者年輕時

待到清中葉初次接觸後的近一個半世紀後，寧波才正式登場了一本貿易用途的英文教材《雜字文》。對於寧波而言，並與廣東相較，該書可稱得上是一本遲到了的英語洋涇浜教材。它的出版，也意味著寧波地區的英語學習由十八世紀的起步與摸索的洋涇浜英語萌芽期，在鴉片戰爭期間，進入了有跡可循的教材洋涇浜英語學習階段，且起點較高，直接越過了粗糙的洋涇浜教材階段而進入相對專業的教材編寫階段。¹⁵

(一) 藏本現狀

《雜字文》的基本信息，郭紅的論文已經有了相當基礎的介紹，¹⁶本

曾與東印度公司進行過貿易，能說幾句英文。這位商人言說同他交易的菲次休先生 (Mr. Fitzhugh) 與貝文先生 (Mr. Bevan) 二人，曾經是東印度公司駐紮寧波與舟山的代理人，是「洪任輝事件」中的知名人物。1753年，東印度公司試圖恢復與寧波的貿易，指派廣州通事洪任輝 (James Flint, 1720-?) 隨行前往寧波。1755年，公司大班喀喇生 (Samuel Harrison, ?-?)、菲茨休 (Thomas Fitzhugh, ?-?) 與翻譯兼大班的洪任輝到達舟山，貝文 (Thomas Bevan, ?-?) 則是 1757 年隨洪任輝赴寧波的見習生、學習漢文的翻譯員。據此推論，舟山的老商人當在 1755-1757 年 (一口通商) 之間習得的英語。D'Arcy-Brown, *Chusan*, 37;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1797), 416-17; (英) 斯當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頁 214；(美) 馬士 (H. B. Morse) 著，區宗華譯，朴樹惠校，章文欽校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1635-1834 年)》第 5 卷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頁 56、296；田力，《早期中英關係史》，頁 180。

15 孫廣平曾對晚清英語教科書進行細緻地分類與考察，他將晚清英語教科書之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以洋涇浜英語文本為主萌芽期 (1807-1840)、認識到英文教材重要性之發展期 (1840-1895)、英文成為主課之成熟期 (1895-1911)。《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之書背景，位處萌芽期向發展期的過渡時期，且是寧波方言與英文語言接觸初期的教材，雖然帶有濃重的洋涇浜特徵，但在形式上已經具備嚴謹教材的諸多面向。孫廣平，「晚清英語教科書發展考述」(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論文，2013)，頁摘要。

16 其一，郭文對《雜字文》進行了確切的定性，即為外國人出版之最早的寧波方言書籍。換言之，亦可稱呼之為第一部吳語地區洋涇浜英語教材。其二，郭文梳理的英國征服舟山的歷史，做了詳盡梳理。簡言之，1841-1846 年英國攻占舟山，試圖永久割據舟山，故在舟山設立管理機構，以圖長久統治。作者即是從印度馬德拉斯而

節在其基礎上對缺漏處作一些補綴、細節層面的嚴密考證，及書籍出版、傳播方面進行考察除蔽，其餘不多贅述。郭、陳、徐文指陳《雜字文》目前僅知在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 簡稱《大英本》）與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Oxford, 簡稱《牛津本》）有藏。而實際上除此之外，尚有其他機構典藏——英國杜倫大學綠宮圖書館（Palace Green Library, Durham University, 簡稱《杜倫本》）、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SOAS Library, 簡稱《SOAS 本》）、美國羅格斯大學亞歷山大圖書館（Alexander Library, Rutgers University, 簡稱《羅格斯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C.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簡稱《哥大本》），本文即選用《大英本》為底本，所獲其他版本為輔，進行綜合研究。¹⁷

（二）書籍史視野下的《雜字文》

基於《雜字文》所藏圖書館包含三大洲，故推測《雜字文》存在於書籍市場流動的可能性。¹⁸ 在《圖博納的世界主要語言與方言詞典及語法目錄》

來的隨軍學者，駐紮時間是 1842 年至 1846 年。1846 年 3 月，中英簽署條約，舟山交還清朝，5 月交接之時，所有外國人一律驅逐。本書即在如此倉促的時候出版，故而印刷量相當之低，在當時影響力也忽略不計。其三，該書未列出在基督教文獻目錄中，即便收錄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一些目錄類書籍中，也僅列出書名、作者、卷數、年代等基本信息，甚至在 1882 年的目錄中，已經將出版年份誤作 1856 年。到了二十世紀初時，該書便已經極其稀有了，遂導致該書難為後世學者所關注。郭紅，〈第一本寧波方言英漢詞彙集〉：21-28。

- 17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館藏編號為：Sinica 450，註記中說明該書為「線裝 1 冊，共 319 頁，26.2 公分」；大英圖書館館藏編號為：System number: 003327374；杜倫大學綠宮圖書館特藏（Special Collections）編號為：PLC661 STR；SOAS 特藏（Archive & Special Collections）編號為：EB84.483/48876；羅格斯大學亞歷山大圖書館東亞稀有文獻（East Asian Rare Materials）編號為：OCLC: (OCoLC)ocm46445582，圖書館註記為 Mrs. Janet Wang 所贈；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館藏編號為：SPECIAL COLL. 5196 2746。
- 18 大部分語言學者針對晚清英語教科書進行研究時，主要就書籍承載的知識作相應的研究，甚少關注教科書這一載體相關的出版史或書籍史議題，而這方面主要是由歷史學者所關注，故而容易造成研究空白。本研究希望將二者結合，呈現更全面的《雜字文》圖景。

(*Trübner's Catalogue of Dictionaries and Grammars of the Principal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the World*, 1882) 書目中，一併羅列出中國語言相關字典、語法書的書籍信息與售價。《雜字文》在出版三十餘年後(《目錄》所列出版時間有誤)的要價是 2 英鎊 12 先令 6 便士 (£2 12s. 6d.)，索價不菲，但並非所列同類中國語言類字典、詞彙書、語法書、讀本類書目中售價最高者。茲試擇時代與卷數相近且非出版於歐洲著作者，列舉如下表一：

表一 《圖博納目錄》中十九世紀中葉中文書目價格表¹⁹

書籍及出版信息	售價	書籍及出版信息	售價
Pillay, P. Sreenevassa, <i>Chinese Vocabulary and Dialogues, containing an easy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Ningpo Dialect</i> . Large 8vo. Chusan, 1856. (仙尼華四,《雜字文》)	£2 12s. 6d.	Bridgman, <i>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i> . [...] Very rare. Macao, 1841. (裨治文,《廣東土話文選》)	£5 5s.
Callery, J. M., <i>Dictionnaire phoné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i> . 2 vols. 8vo. Macao, 1841. (加略利,《漢語詞典》)	£2 2s.	Medhurst, W. H., <i>Chinese-English an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containing all the words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Dictionary according to Radicals</i> . 4 vols. Scare. Batavia and Shanghai, 1842 and 1857. (麥都思,《華英字典》)	£5 5s.
Callery, J. M., <i>Systema Phonicum Scripturæ Sinicæ</i> . 2 vols., imp. 8vo. Macao, 1841. Very Scarce. (加略利,《字聲綱目》)	£2 3s.	Premare, P., <i>Notitia Linguae Sinicæ</i> . [...] Malacca, 1831. (馬若瑟,《漢語劄記》)	£2 2s.

19 Trübner & Co, *Trübner's Catalogue of Dictionaries and Grammars of the Principal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the World* (London: Trübner, 1882), 32-37.

書籍及出版信息	售價	書籍及出版信息	售價
<i>Morrison's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i> . [...] Together 6 vols. Royal 4to. Macao, 1855-72. (馬禮遜,《華英字典》)	£6 6s.	William, W., <i>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i> . 8vo. Macao, 1844. (衛三畏,《英華韻府歷階》)	£1

當時已成罕本的書籍，皆有註記「稀見 (rare/scarce) / 極稀見 (very rare/scarce)」，可推導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這些書籍尚在歐洲書市上流通。

再依《牛津本》藏書章記錄，《雜字文》是在 1891 年 2 月 3 日納入館藏，又可側面印證該書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確尚在英國書市流通（即便是來自捐贈）。《SOAS 本》依照《登記冊》顯示入館時間為 1946 年 7 月 9 日，來源未知，故而存在購入與捐贈兩種可能性。《羅格斯本》來自王女士的捐贈，具體時間不詳。《杜倫本》亦未有確切時間，僅知曉它最初是大學東方學圖書館的一部分（學院成立於 1951 年）。至於《大英本》，則明確記錄是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的前身即大英博物館閱覽室）於 1863 年 4 月 15 日通過購買納入館藏的，原屬大英博物館印刷書籍部（Department of Printed Books, British Museum）的中文收藏，1892 年後再歸入新成立的東方印刷書籍與手稿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ripts, British Museum）。可惜購書發票已經亡佚，難覓購書源頭。然依照原書英文版權頁上的銘文，還可推測該書的最初擁有者可能是 P. Blake，身分未知，他在該著出版後四個月（1846.9.21）左右獲得該書，又與後文即將提到的瑪高溫撰寫該書推薦信屬同一月份。²⁰ 而同年

20 感謝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特藏部館員 Joanne Ichimura 惠賜圖書館《登記冊》(Accession Register) 訊息與書影；羅格斯大學圖書館沒有明確記錄《雜字文》收入圖書館的確切時間，但圖書館給出三種流通的可能性：其一，來自二十世紀圖書館接受了一批來自東南亞一位前輩的中國舊書捐贈；其二，來自於羅格斯大學同一城市的新不倫瑞克神學院 (New Brunswick Theological Seminary) 轉移給大學圖書館的一批中國古籍；其三，大學曾有專門研究吳方言的教授，或許促成王女士的捐贈。

的《撮要》很可能在出版後次年，就由其兄弟 Rev. David Thom 捐贈給大英圖書館，而該版本又在 1970 年被重新裝訂，呈現一種相似的書籍流轉與修繕命運。²¹ 而《馬德拉斯圖書館藏本》，經筆者詢問圖書館歷經改組後的柯尼馬拉公共圖書館（Connemara Public Library），所得答覆是未見館藏，似已亡佚。

因原書並未標注價格，所以無從知曉仙氏預備售價幾何，只能藉書中序言與歐洲流通書價，及與同年羅伯聃出版之《撮要》比較兩條路徑來推導書籍面對的預設讀者群體是何階級。當然，該書也存在未及出售，僅贈送友人、上司、學術團體、圖書館與政府機構的可能性。若假使該書曾經出售，則書價會有幾何？按《雜字文》中英序言，該作面向的潛在讀者群體是中國人（寧波人）與印度人，²² 以條約口岸寧波與自由港舟山作為語言習得與應用的有利後盾。按邵義的〈金銀比價和銀兩與英鎊、法郎的兌換率表〉，1882 年 1 英鎊可兌換 3.819 兩銀，因此 1882 年的《雜字文》的售價約是 10.2 兩。²³ 就當時英國人而言，溫飽之家購入此書較有壓力，小康與富裕家庭則可接受。²⁴ 為求直觀感受此類教材的不菲售價，按英格蘭銀行通貨膨脹計算器（Inflation calculator, Bank of England, 1882 年至

此處又蒙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David Helliwell 退休館員、羅格斯大學東亞圖書館楊濤先生、杜倫大學綠宮圖書館 Danielle Westerhof 善本策展人（Rare Books Curator）、大英圖書館 Emma Harrison 館員與大英圖書館團體檔案部（British Library Corporate Archives）記錄與檔案助理 Victoria Ogunsanya 惠賜《雜字文》藏書與購買信息，一併特申謝忱。

- 21 感謝大英圖書館善本和音樂參考團隊（Rare Books & Music Reference Team）鄭脩華（Wallace Kwong）提供的書籍信息、照片與 Rev. David Thom 致大英圖書館的書信（該信在電子化時因折疊而存在影響閱讀的情況）。
- 22 （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寧波：寧郡東壁齋刻；舟山：定海舟山南門外太保廟刊，1846），頁 preface、序。
- 23 邵義，《過去的錢值多少錢：細讀 19 世紀北京人、巴黎人、倫敦人的經濟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30-31。
- 24 十九世紀英國物價相當穩定，在倫敦五口之家最低生活用度為 56 英鎊 6 先令 8 便士，而當時英國倫敦貧窮、溫飽、小康、富裕家庭收入分別是小於 60、60-300、300-700、大於 700 英鎊。邵義，《過去的錢值多少錢》，頁 105、118-125。

2023 年 3 月)，²⁵ 珍本《雜字文》1882 年單價約等於今之 254.63 鎊，《英華韻府歷階》約為 97 鎊，《英華字典》約在 611.1 鎊以上，足見當時的高昂書價。若考慮幾十年後的時間與在英國流通的中國書籍等原因，所帶來的遠距離、數量稀缺等因素所附加的價值，《雜字文》在 1846 年後寧波府地區的售價當遠低於此。

如此，便產生一個疑問——仙氏何以選擇舟山當地之中式雕版印刷，而不選擇更為先進的、且在舟山也設有傳教站的美長老會之西式活字印刷？毋庸諱言，仙氏選擇何家印書房是其主觀自由擇取之結果，但一些客觀因素也當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從文獻學角度而言則可歸屬作者意圖的一部分。²⁶ 首先，仙氏選擇寧波東壁齋刊刻，由定海外太保廟印刷主要有降低成本之考量。與之可以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羅伯聃同年在寧波長老會之華花聖經書房印刷之西式活字本《撮要》，精美程度略勝《雜字文》。同時，《撮要》與《雜字文》之長度皆在 26 公分左右，擁有類似的藍色書衣，同樣沒有書籤，二者可謂是該時該地中西文化交匯下出版史上的雙璧（參圖一）。羅氏的《撮要》乃是 1846 年 8 月印刷完畢，前後花費 9 個月，支付金額為 259.75（美）元，利潤高達 100 元，是為書房歷年收入最高的單筆印刷費。羅氏共計印刷 50 部，每部成本 0.5 多元。同年，有位張姓官員希望書房印刷一部篇幅不小的中國史書抄本 50 部，以為少量印刷會如雕版印刷一般成本較低，卻不曉西式活字印刷成本較高，需要大量印刷量才能降低成本，他最終為高額成本嚇退。²⁷ 顯然，仙氏因自費出版，難以承擔如此龐大的印刷費，從中亦可推測仙氏的印量不高，成本當低於 0.5 元，此也解釋了為何存世較少，除了本就遺留舟山而造成的亡佚外，還有本身印刷量不高的雙重原因。

總言之，以下因素影響了仙氏選用雕版印刷：其一，成本與經濟效

25 “Inflation calculator,” Bank of England, updated May 22, 2024,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monetary-policy/inflation/inflation-calculator> (accessed April 28, 2023).

26 作者意圖包含字體、版式、紙張、開本等非實質內容。顏慶餘，〈作者意圖與文本考證學〉，《文藝評論》2021.5(2021.10): 13。

27 蘇精，《鑄以代刻》，頁 371；氏著，〈中西印刷術交會中的誤會〉，《文匯學人》2017.4.21: 13-14。

益——1840 年代之中式雕版印刷的價格低於西氏活字印刷，²⁸ 1846 年的華花聖經書房完成排版的速度亦不快於雕版，²⁹ 而雕版印刷則滿足少量印刷，其後可以隨時加印的需求；其二，地理因素——華花聖經書房位於府城寧波，雖然舟山亦有長老會的傳教站，但外太保廟位於定海南門外，臨近定海港，對供職定海軍政府的仙氏而言有地利之便（參圖三），³⁰ 可在定海自由行動又方便去寧波及運往他地，³¹ 既能隨時加印，接近讀者群體——方便贈送舟山與寧波府城的長官、同行與友人，而郡城寧波的雕版產業定然比位處海島的定海成熟，故而須得藉助寧波；其三，技術難關——《雜字文》中的泰盧固文，華花聖經書房當無法用活字印刷，故而只能印刷《雜

28 美長老會傳教士婁理華（Walter M. Lowrie, 1819-1847）於 1842 年 11 月 16 日在澳門致父親書信中，曾提及在未來幾年內中文木刻印刷要遠比金屬活字來得便宜。蘇精，《鑄以代刻》，頁 321。

29 晚清雕版的刻字速度參大木康所據刊刻《傳忠肅文公文集》之例，一天大概可達 270 字。《雜字文》內文共 3193 組詞彙，加上英文、泰盧固文、寧波方言注音，與序言、目錄等，粗估不到 4 萬字，計算上外文字體的陌生，估計五個月至六個月可以完成雕刻。若選用西式活字，可能需要類似張姓官員與羅氏的八九個月。（日）大木康著，周保雄譯，《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頁 32。

30 按民國《定海縣志》，定海有太保廟二，其一位於城內之南門大街，其二位於觀山麓，後者相傳為伏虎太保，於同治三年重建，參縣志所附城廂全圖可知，外太保廟即伏虎殿。陳訓正、馬瀛，〈營繕志第二〉，《定海縣志》第 2 冊（上海：定海旅滬同鄉會，1924），頁 14b。

31 雖然開埠初期，依照不平等條約，洋人不能隨意離開口岸進入鄉下。但是同為寧波府區域，舟山為英軍所據，鴉片戰爭期間寧波也數度陷於英軍，實際上舟山與寧波府城之間的來往相當密切，尤其是多名傳教士頻繁活動於寧波府城—舟山群島（尤其是定海），且傳教士進入寧波的航道也主要以舟山—香港航線，轉舟山進入寧波。如郭實獵在英軍攻陷寧波後，被任命為寧波偽知府與舟山民政官，42-43 年任舟山長官，來補姚懷祥之缺。再以長老會為例，寧波傳教站開闢初期，1843 年麥嘉締（Divie Bethune McCartee, 1820-1900）乘坐美國船自香港前往舟山，歷時約 9 日。至舟山後拜訪駐舟山的英軍長官後，第二日坐中國帆船到達寧波。若以倫敦會為例，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1863）曾在 1842 年，從香港前往舟山，因為寧波的戰爭局勢，不斷來往舟山、寧波定居。此外《華友西報》在該時期也時常刊登香港至舟山的航線廣告。田力，「寧波長老會寧波差會在浙東地區早期活動研究（1844-1868）」，頁 35-40；“Departures,”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April 7, 1842, 12.

字文》中的英、中文部分，泰盧固文需額外補寫，若要印刷則需要自馬德拉斯購入泰盧固文字模或再鑄新模，工序更為繁瑣，成本更高，不若雕版印刷便捷、低廉。從以上三者，選擇在舟山雕版印刷，都是省時、省力、省錢的較優方案，可以壓低《雜字文》售價，以圖書籍的傳播廣度與涵蓋更多的讀者群體。並且，或許是出於自身印刷需求，仙氏在編寫時就關注到了印刷相關詞彙，如「造書」、「造書人」、「刻字先生」、「印刷司務」、「紙司務」、「釘書司務」等。³²

《撮要》在 1880 年德國書市的售價是 2.11 黃金馬克，1880 年代 1 黃金馬克等於 0.048 鎊，即 0.097 鎊（約為今日之 9.4 鎊），即或 0.37 兩銀，即約 618 文，遠低於同時期《雜字文》。³³但依當今遺存數量而言，《撮要》遠超《雜字文》，更遑論羅氏就其地位與影響力，非仙氏可與之比肩，故而歐洲書市流通的《撮要》數量絕非《雜字文》可比，於是可解釋《撮要》在三十餘年後，與成本的 0.1 鎊並無漲幅。故而 1880 年代書市價格無法反映二書在 1846 年寧波書市之價格。按《撮要》的高昂成本，《雜字文》售價與印量均應在其下。遂推測，《雜字文》當年之售價至高在 0.1 鎊之下，即 500 餘文錢，印刷量不到 50 部。參華花聖經書房 1865 年出版之《地球說畧》印刷量達到驚人的 9000 部，故售價每部可以壓到 120 文錢（一百十餘葉，曾低至 80 文錢），1856 年上海墨海書館《大英國志》篇幅為前者 2.5 倍（三百餘葉），售價卻為 500 文錢。³⁴《雜字文》葉數與《大英國志》相仿，但文字體量遠遠不及，結合此因素與

32 (印) 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219b、223a、224b。

33 Otto Harrassowitz, *Antiquarischer Catalog* 62 (1880): 104; Micheal Bordo and Angela Redish, "Putting the 'System' in the Intern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 *Money i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Middle Ages to Bretton Woods*, ed. David Fox and Wolfgang Ern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599; 銅錢匯率參考同治五至九年，浙江會稽 1 兩可換 670 文，邵義，《過去的錢值多少錢》，頁 5；貨幣歷史匯率均參考 Rodney Edvinsson, "Historical Currency Converter," *Historicalstatistics.org*, updated January 10, 2016, <https://www.historicalstatistics.org/Currencyconverter.html> (accessed March 20, 2023).

34 蘇精，《鑄以代刻》，頁 436-437；(美) 禱理哲 (Richard Quarterman Way)，《地球說畧》(寧波：華花聖經書房，1856)；(英) 托馬斯·米爾納 (Thomas Milner) 著，(英) 慕維廉 (William Muirhead) 編譯，《大英國志》(上海：墨海書院，1856)。

《撮要》之售價，《雜字文》若存在出售的情況，價格至高在 500 文左右。當然，因為英軍倉促撤退，《雜字文》最終未及出售的概率極高。但無論如何，該書最終還是流入了歐洲書市，存在一定出售可能。對於其價格的推測，即是對潛在讀者的觀察，也是對該時期寧波地區出版史的案例考察。

不到 500 文的書價，是溫飽之家可以承受的範圍，而小康與富裕家庭更毫無負擔。³⁵ 此外，從識字率來論，羅友枝 (Evelyn Rawski) 的功能性 (functional) 識字論斷雖然備受爭議，但該假說探討的正是處理畫押、記賬、通信等日常經濟與生活相關群體，正合乎《雜字文》潛在讀者群體。³⁶ 故而，溫飽以上的商人家庭有大比例人群可以作為《雜字文》販賣的目標讀者群體。既然中國讀者群體可以承擔書價，而馬德拉斯人亦達到了可觀的潛在閱讀群體數量。³⁷ 如此意味著，在《雜字文》出版之前，僅來自馬德拉斯地區的駐軍為代表的潛在讀者數量一度達到 850 人，還未計入商人、學者、政府僱員等便相當可觀。若非該書印刷時面臨英軍撤退的局面，該書憑藉華人、印度人與英美傳教士、歐美學術團體構成的市場，或可大賣。

以上書籍史的討論，牽涉出版學與傳播學視角，同時更想藉《雜字文》案例來反映社會史與文化史視野下，揭示 1840 年代寧波地區在中英交流

35 按購買力而言，同光時期 (1862-1900) 物價相對穩定，按邵義的估算，1880 年代在京富裕五口之家的年開銷要達 983 兩之鉅，五口之家最低年用度為 48.42 兩。就收入而言，貧窮、溫飽、小康、富裕家庭的收入分別在低於 50、50-300、300-100、大於 100 兩。雖然寧波地區收入與開銷與京師相異，但寧波當時作為府城與通商口岸，收入與開銷亦可客觀，所以北京的收入與開銷應當具有一定的參考性。邵義，《過去的錢值多少錢》，頁 38、60、63-66。

36 羅友枝認為在十八、十九世紀，中國人的功能性識字率為男性占 30-46%，女性占 2-10%。劉永華，〈清代民眾識字問題的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7.2(2017.6): 98-99。

37 按法國人 1845 年出版之調查，在定海的英軍數量大概有 1800 人，第 18 步兵團 850 人、第 2 團 (馬德拉斯軍) 700 人、英國砲兵 100 人、馬德拉斯砲兵 (工程兵) 150 人。Société Orientale de France, "Quelques ports de la Chine (1)," *Revue de l'Orient: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orientale* 7 (1845): 203.

下語言、思想、文化、人員交往、書籍與知識傳播、社會變遷的部分面貌。

(三) 影響力重探

郭紅判定該書影響力時，認為本書出版後影響力極小，最主要的依據有三：其一，出版時間之 1846 年 5 月，恰逢 1846 年 3 月中英簽訂協議，交還舟山全島，外國人匆忙撤退，因書籍體量龐大，印數應當不大，大部分應當留在舟山而不知所蹤，僅有少部分被帶走；其二，編者身分非為傳教士，出版地並非在寧波府城，遂導致影響力不足；其三，英國已納香港，學習寧波方言對於官方來說失去了迫切性；仙尼華四返回印度後，未再進行後續的推銷，以擴散《雜字文》的影響力。³⁸ 上文已然解釋仙氏選擇在舟山出版而非寧波的現實因素，而舟山在中外交流的影響力低於寧波的部分觀點，則是將今論古，違背史實。

但一些新的文獻資料可以幫助重新思考《雜字文》影響力的問題，包含窺視該書在讀者群體中初步的流轉狀況。就典藏而論，《雜字文》並非僅孤藏英國兩大圖書館，而是由舟山擴散至寧波、英、印、³⁹ 美，涉及東亞、南亞、歐洲、北美地區；而就傳播而言，《雜字文》不僅在十九世紀

38 郭紅，〈第一本寧波方言英漢詞彙集〉，頁 26。

39 依《1879-1881 年馬德拉斯官立中央博物館下屬公眾圖書館補充目錄》之登記，中文項藏有 *Chinese Vocabulary and Dialogues* 一冊 8 卷，作者 P. Streenevassa Pillay，出版地為 Chusan，出版時間 1846，即《雜字文》。觀 1856 年之《目錄》，則錄有 *Vocabulary, in Chinese* 一冊，其餘信息不詳，或許就是由仙尼華四或其同鄉帶回馬德拉斯的《雜字文》，在 1853 年博物館附屬公眾圖書館成立階段時由其本人或其他人贈送的。同時，據當時在舟山傳教的美北長老會傳教士露密士（Augustus Ward Loomis, 1816-1891）回憶，舟山曾經存在一個小型的流通圖書館（書籍有長老會出版物、小冊協會〔Tract Society〕以及其他傳教士圖書館）機制，書籍可隨駐軍撤換回印度時流通至印度。就此而論，舟山形成了一個可以連接印度、歐美、香港的書籍與知識傳播的管道。“Chinese Books,” in *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Books in the Public Library of the Government Central Museum, Madras. 1879-1881* (Madras, 1881), 96; *Catalogue of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Government Central Museum, Madras* (Madras, 1856), 29; “About Us,” Government Museum, Department of Museums, Egmore, Chennai, Tamil Nadu, <https://www.govtmuseumchennai.org/museum/static.jsp> (accessed October 1, 2022); A. W. Loomis, *Scenes in Chusan, or Missionary Labours by the Way* (Philadelphia, 1857), 36.

歐洲之出版的書目著錄中實屬常客，且在二十世紀中至下半葉在英國書市流通。⁴⁰ 尤其在法國漢學界不曾缺席，除考狄《中國書目》外，《雜字文》

40 各書目登記作者之名時，有時拼寫有異，若不注意，易導致統計之時更顯得《雜字文》默默無聞。比如在法文文獻中，Streenevassa Pillay 作 Strenassa Pilay。如 1878 年巴黎刊行之《東方與美洲雜誌》(*Revue orientale et américaine*)，由漢學家鮑狄埃 (G. Pauthier, 1801-1873) 在中「中西書目」(“Bibliographie Sino-Européene”) 欄發表〈大批印刷於中華帝國的稀有珍貴作品的歐洲目錄〉，按年代先後排列登記在中國出版的珍本。文中 1846 年的作品，按次序為出版於上海的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譯《書經》(*Soo-king*)、出版於寧波的羅伯聃《撮要》以及出版於舟山的英華仙尼 8 卷本英譯《雜字文》。同年，考狄 (Henri Cordier, 1849-1925) 的皇皇鉅著《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第一部分·狹義中國》(*Première partie—la chine proprement dite*) 冊中的〈文學與語言〉(“Langue et littérature”) 章下，收錄了《雜字文》的基本信息。考狄之著是漢學的必備書籍，他憑藉該書於 1880 年獲得法國儒蓮獎 (Prix Stanislas Julien)，衛三畏曾在《中國總論》裡提及該書，頗有奉為圭臬之意。在英文書目中，《雜字文》出現頻率亦是不低，如 1874 年之 *A New Catalogue of English Books; Followed by the General Library of the Late Jesse Watts-Russell, Esq., of Ilam Hall, Staffordshire* 這套書目中，書名被附加上了作者的名字作 *Pelly's Manual for Youth and Students of Chinese*，作者名作 “P. Steenevassa Pelly”，且註明珍稀。德國學界則如穆麟德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1847-1901) 之《中漢籍目錄便覽》(*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Being a List of Work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China*) 出版早於考狄，該書以英文寫作，於 1876 年同時發行於上海、倫敦與德國哥利茲 (Görlitz)。《便覽》中，作者名拼法依舊有所差別，書作 “Strenassa Pilay”。該書於中國長時間不乏讀者，比如葉靈鳳 (1905-1975) 在其 1969 年 1 月 13 日的日記中回憶閱讀該書：「燈下翻閱穆倫都爾夫的《中國書目》，此係一八七六年出版者，現在已經很難得。」分別見：(美) 衛三畏 (S. Wells Williams) 著，陳俱譯，《中國總論》上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433；葉靈鳳，《葉靈鳳日記·上 1943-1967》(香港：三聯書店，2020)，頁 123；G. Pauthier, “Catalogue d’ouvrages Européens, pour la plupart raes et curieux, imprimés dans l’Empire Chinois,” *Revue orientale et américaine*, nouvelle série, 2 (1878): 57-58;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vol. 1 (Paris, 1878), 754; Bernard Quaritch, *A New Catalogue of English Books; Followed by the General Library of the Late Jesse Watts-Russell, Esq., of Ilam Hall, Staffordshire* (London, 1874), 1010;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and Otto Franz von Möllendorff, *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Being A List of Work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China* (Görlitz, Germany, 1876), 13.

出版後三年左右，身在巴黎的德裔東方學者朱利葉斯·莫爾（Julius von Mohl, 1800-1876）已經在其 1849 年文章〈1848 年東方語言與歷史研究的進展表〉（“Tableau des progrès faits dans l'étude des langues et des histoires de l'Orient, pendant les années 1848”）中，提到小斯當東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關於「上帝」（God）中譯問題時，提及了兩本書，其一是 1847 年在香港出版之德萬（Thomas T. Devan, 1809-1890）之《中國語啟蒙（廣東白話）》（*The Beginner's First Book in Chinese [Canton Vernacular]*），另一本便是《雜字文》。⁴¹ 中文學界書目中也非鳳毛麟角，如王爾敏於 1975 年編纂之《中國文獻西譯書目》中即列有《雜字文》，⁴² 內地則有 1993 年聶建民、李琦編纂之《漢語方言研究文獻目錄》，⁴³ 近年游汝杰則有《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中的吳方言詞彙、詞典部分。⁴⁴ 換言之，《雜字文》自十九世紀中葉起至今在中西書目中一直未曾缺席。據此而論，《雜字文》在書目傳播方面難謂遜色於普通傳教士，

41 書中提到的小斯當東的著作應當是 1849 年出版的 *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因為莫爾用分號斷開小斯當東的著作，故而易混淆《雜字文》與《中國語啟蒙》是出自小斯當東之作還是莫爾自己的文字。然經筆者查考該書，小斯當東著作中並未提及二書，二書的信息應該源自莫爾自己。Jules von Mohl, “Tableau des progrès faits dans l'étude des langues et des histoires de l'Orient, pendant les années 1848,” *Annales de philosophie chrétienne* 119 (November 1849): 335-36;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1849).

42 《中國文獻西譯書目》僅列出英文書名、作者名與出版時間，未列出版地，且將仙尼華四書為“P. Streenevassa Pelly”，異於它書。參王氏之參考文獻，列有《中國書目》，《雜字文》當來源於此。王爾敏編，《中西文獻西譯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頁 455-456、700。

43 聶建民、李琦編纂，《漢語方言研究文獻目錄》（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頁 207。

44 然游氏提到《雜字文》僅見於大英圖書館，它館未見的說法，因早年資料不若當今便捷，故有所疏失，修正為「少見於別地圖書館」。游汝杰，《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頁 10；氏著，《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增訂本）》，頁 17。

館藏亦非孤本，也並非未曾踏及印度故土。

郭氏歎息《雜字文》若能由傳教士所編，則不至於落得備受忽略的境地。然而，美北浸禮會傳教士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cgowan, 1814-1893）證明了舟山與府城傳教士交往密切程度，《雜字文》出版不久便已被寧波城內的傳教士閱讀了。1847年8月4日星期三，英國皇家亞洲學會之前身——設立在印度的孟加拉亞洲學會（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召開的月會上，⁴⁵分享了1846年9月來自寧波的瑪高溫寫給學會秘書的信件，簡要介紹《雜字文》作者與作品基本信息，並將之推薦給學會——「喜愛東方文獻的朋友會對這本集印度人思想於一體的語言學珍品感興趣」。⁴⁶職是之故，《雜字文》書之影響力相較知名傳教士論著確實低，但事實是被過於低估了——作為一名生平難考，僅留下隻字片語背景的人物，其傳播廣度已不遜於普通傳教士。

三、東中有西：《雜字文》介紹與考證

結合《雜字文》序言與瑪高溫的推薦信，以下對《雜字文》進行更為全面的介紹與細節信息的考據。⁴⁷作者仙尼華四，印度籍，出生於東印度的馬德拉斯（今清奈）附近的帕拉瓦拉姆（Palaveram，今作：

45 孟加拉亞洲學會於1784年由英國人喬恩思（William Jones, 1746-1794）在加爾各答成立，先後發行《亞細亞研究》（*Asiatic Researches*）與《皇家亞洲學會雜誌》（*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隨後孟買學會與馬德拉斯學會相繼成立。王毅，《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8。

46 瑪高溫撰信時間正是《雜字文》出版後不久，且其信函寄出地點也為寧波，可以證明《雜字文》曾在寧波流傳。然而，目前在印度亞洲學會（Asiatic Society）附屬圖書館的目錄內，未有《雜字文》的記錄。遂有兩種可能，或許那時的學會就未曾收到實體書，或者已經遺失了。為此筆者曾致信亞洲學會圖書館，圖書館回復並未見館藏記錄。此處特別感謝提供幫助的亞洲學會圖書館館員Pritam Gurey。“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August, 1847,”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6, no. 2 (1847): 988.

47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August, 1847,” 988-89; (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preface。

Pallavaram)，屬庫努種姓 (Curnum Caste, 按：以擔任村落會計為主，擅長多語)。⁴⁸ 鴉片戰爭期間，他隨馬德拉斯遠征軍的軍需處副助理總監 (D. A. Commissary General) 麥考利上尉 (Capt. Macaulay)⁴⁹ 來到中國。仙氏 1842-1846 年居住舟山期間，主要擔任 (陛下之) 軍需處 (H. M.

- 48 在 1837 年《浸會雜誌》(*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中的 1836 年 12 月 21 日〈戴先生書信摘錄〉(“Extracts from a Letter of Mr. Day”) 曾提及，庫努種姓再次於婆羅門種姓 (“next but one to the brahmin caste”)。據此推論應當類似於第三階級的、以商業為主的吠舍 (Vaishyas)。不但如此，在 1853 年 6 月 14 日馬克思致恩格斯的書信中，引用的一份資料清楚提到了庫努種姓：「每個村落是、而且在實際上常表現為一個分離的村社或共和國。官吏：一、……二、庫努 (Curnum)、善波格 (Shanboag) 或浦特華禮 (Putwaree) 擔任記錄。」最後按《與英屬印度政府行政相關的官方檔中出現的司法和稅收術語以及有助益的詞的詞彙表》記錄，Cumum，又可寫作 Karanam、Karanam、Karnam 等，泰盧固文作 కరణము，通常是某一村莊的會計，屬於村莊的辦公主任之一。該種姓在特林加 (Telinga) 地區是婆羅門，在泰米爾 (Tamil) 地區則是首陀羅，指的是 Pilli 部落 (tribe)。同時，十九世紀初，東印度公司也開始關注泰盧固文教育以及印刷該語言作品，就連東印度公司中的英國官員也開始學習泰盧固文以用於日常治理，這也意味著來自該地區的部分英國人也可以閱讀《雜字文》。而 Karanam 通常未受嚴格的學校訓練，他們掌握泰盧固語多源自辦公室訓練，且主要是用途是官方的商務記錄。此外，多數庫努是多語言者 (polyglot)，掌握梵文、波斯語、阿拉伯語、泰盧固語等，且不追求成為學者，只關心為政治服務，志於成為優秀的抄寫員。此番考證，有助於解釋仙氏為何能在舟山政府擔任首席會計的種姓背景，推測其種姓可能並非高種姓，以及其可以掌握多語的合理背景，又可推測《雜字文》讀者群可包含來自馬德拉斯地區的英國人。分別見：“Extracts from a Letter of Mr. Day,”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17 (1837): 300; Horace Hayman Wilson, *A Glossary of Judicial and Revenue Terms: And of Useful Words Occurring in Offici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1855), 263; Velcheru Narayana Rao, “Print and Prose: Pandits, Karanams, and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Telugu,” in *India’s Literary History: Essays o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 Stuart H. Blackburn and Vasudha Dalmia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4), 147-50; (德) 馬克思 (K. Marx)、(德) 恩格斯 (F. Engels) 著，李季譯，《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 (1844-1853 年)》(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 553。
- 49 考之 1846 年英國《軍隊名錄》軍需處 (Commissariat Department) 條目下的軍需處副助理總監 (Deputy Assistant Commissaries General) 的名單中，符合麥考利上校全名者可能是 Hector J. Macaulay，來自西印度。*The Army List, for August, 1846* (London: War Office, 1846), 81.

Commissariat) 的首席會計 (Head Conicopoly)。⁵⁰ 按其〈序言〉自述, 居住舟山期間, 他孜孜不倦學習寧波方言, 用以協助軍需處副助理總監格林紳士 (Hy. Green Esq.)⁵¹ 履行辦公室的日常公務, 這份工作發揮了仙氏庫努種姓擅長文書與會計的背景。而格林任職時間, 也有助於推斷仙氏學習寧波話乃至編寫《雜字文》的開端時間。按照 1843 年 2 月 17 日英國陸軍部 (War Office) 的升遷與任命公告, 格林此時被拔擢為副助理總監,⁵² 這也意味著仙氏學習寧波話與《雜字文》醞釀的時間上限為 1843 年, 即仙氏到達舟山的次年。

《雜字文》全書乃 1 冊線裝本, 版式為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 共 319 頁, 長 26.2 公分。若依目前最常見之《大英本》而言, 該藏本可謂洋裝在身 (參圖一), 尤其是封面的聖愛德華王冠紋章 (Crown of St Edward [heraldry]) 圖案頗為惹眼, 可能為大英博物館圖書室 (British Museum Library) 標誌, 從裝幀形式與圖案上大大增加了英帝國元素 (《華英通用雜話》等也採此裝幀)。⁵³ 假使僅參最容易獲得的《大英本》, 則容易引起當代讀者誤解

50 “Conicopoly” 即泰米爾語 “Kanakku-pillai”, 即會計。George Clifford Whitworth, *An Anglo-Indian Dictionary: A Glossary of Indian Terms Used in English, and of Such English or Other Non-Indian Terms as Have Obtained Special Meanings in India* (London, 1885), 72, 148.

51 依照 1845 年發表在《中國叢報》上的舟山地區官員與一般工作人員名錄, 格林紳士全名作 H. Green, 職位同為軍需處副助理總監 (Deputy Assistant Commissary General) 繼而參照《軍隊名錄》可知全名為 “Henry Green”, 來自香港。“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Caton, Macao, Hongkong, Amoy, Fuchau, Ningpo, and Shangha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4 (1845): 16; *The Army List for August, 1846*, 80.

52 *Colburn's United Service Magazine and Naval and Military Journal*, part 1 (London, 1843): 478.

53 此款裝幀在大英圖書所藏有關中國出版書籍 (1840 年代) 中並非常態, 如 1839 年廣州出版之 Sloth (即羅伯聃) 譯《王嬌鸞百年長恨》、1842 於澳門出版之衛三畏《拾級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或是 1846 年於寧波出版之《撮要》等, 其封面皆異於《雜字文》, 惟羅伯聃之《華英通用雜話》與《雜字文》同有皇冠紋樣 (參圖一)。例如, 大英圖書館曾將 1840 年出版於澳門的《字部緝解》從原版的中式裝訂拆開, 重新裝幀為西式書籍, 且改變了該書的結構, 使之不符合原書的從左到右的閱讀順序。Sloth, trans., *Wang Keaou Lwan Pih Nēen Chang Hān, or the Lasting Resentment of Miss Keaou Lwan Wang. a Chinese Tale: Founded on Fact* (Canton, 1839); (美) 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拾級大成》(澳門: 香山書院, 1842); 清·高靜亭纂

——該書付梓時即為中西合璧的裝潢。而實際上，大英圖書館為加強原書的保護，以及為了讓書籍得以按西式書籍的方式垂直放置在書架上，會將中國書籍按西式風格加以硬皮重新裝訂，使之成為一本中西合璧的書籍。⁵⁴ 又因中西閱讀方向的迥異，這也使得重新裝訂後的書籍，原先的背面成為了書籍正面。再對照其他版本，又可發現各版之書衣有所差異，與《大英本》類似的還有硬裝版《SOAS 本》，但不若前者精緻，但可知二版都已非出版原貌。《哥大本》則前頁破損嚴重，似乎已沒有常規意義上的封面。《杜倫本》狀況更是不佳，打開書頁閱讀都會產生損壞，急需保護與修繕。⁵⁵ 但其封面裝幀卻可判斷屬傳統中式——深藍色紙質書衣，書眼依稀可見。惟《牛津本》保存狀態相當完好（參圖一、圖二），書籍封面乃傳統古籍的類似函套材質的厚紙質藍色書衣，且無書籤題寫書名，《撮要》的書衣、無書籤裝幀也與此相似（參圖一），或許藉此相似之處進一步探求晚清寧波的印刷文化。《羅格斯本》與《牛津本》頗為接近，書背或有褪色；與《牛津本》與《羅格斯本》相較，《杜倫本》封面上的英文“Foreign Oppioe”以及書背上的數字“837”是後來添上的可能性更大。就此推論，《牛津本》、《羅格斯本》與《杜倫本》當最接近或者說就是《雜字文》的出版原貌，而書衣上缺少書籤，可能並非因為出版倉促，或許也是當時寧波地區的出版特色。

全書出版信息、序言與目錄，皆由中英雙語形式分別呈現，並以中式

輯，（英）羅伯聃（Robert Thom）譯述，《正音撮要（上卷）》（寧波：寧波華花聖經書房，1846）；（英）羅伯聃（Robert Thom），《華英通用雜話（上卷）》（廣州：出版社不詳，1843）。

54 Rebecca D'Ambrosio, “Consider the Cover: Conserving a Chinese Book,” Collection Care blog, British Library, updated April 9, 2019, <https://blogs.bl.uk/collectioncare/2019/04/consider-the-cover-conserving-a-chinese-book.html> (accessed December 6, 2022); Heather Marshall, “From West to East: Conservation of the Chinese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ollection Care blog, British Library, updated October 17, 2016, <https://blogs.bl.uk/collectioncare/2016/10/from-west-to-east-conservation-of-the-chinese-novel-dream-of-the-red-chamber.html> (accessed December 6, 2022).

55 承 David Helliwell 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館員王成志博士的耐心告知，在此特申謝忱。

書籍樣式裝訂而成，但英文部分依舊有明顯西式排版之特色。《雜字文》內文首頁，乃是中式牌記，中間刻有書名《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右側刻有中西曆法「大清道光二十六年仲夏、大英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五月」、左側刻有出版地與刻書者齋號「定海舟山南門外太保廟內刊」、「寧郡東壁齋刻」。⁵⁶ 次頁則是英文版權頁，書有《雜字文》英文書名：*A Manual for Youth and Students, or Chinese Vocabulary and Dialogues, Containing an Easy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Ningpo Dialect*，作者（兼譯者）、出版地與出版時間為“Compiled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P. Streenevassa Pillay, 1846”。再次頁是致謝辭，仙氏感激了在編纂過程中為其提供幫助的馬德拉斯砲兵團（Madras Artillery）的詹姆士·傑克遜（James Jackson, ?-?）⁵⁷ 與居住在舟山定海的 Shōnge Sing 先生（seasang），⁵⁸ 以及執行校對工作的

56 東壁齋不僅刊刻了《雜字文》，還有其餘如道光戊子年付梓之鄞縣袁氏的《原齋要論》。由是可知東壁齋至少自 1828 年至 1846 年間連綿不斷，應當在寧波當地有一定的影響力。曹炳章輯，《中國醫學大成總目提要》（上海：大東書局，1936），卷 10，頁 34-35。

57 詹姆士·傑克遜是砲兵隊中的馬德拉斯籍步兵（14th Madras Native Infantry），1854 年時的《倫敦憲報》（*The London Gazette*）的〈名譽晉升令〉（“Brevet”），其軍銜由上尉（Captain）拔擢為少校（Major）。另依照 1843 年 6 月《聯合勤務、海軍與軍事雜誌》（*The United Service Magazine and Naval and Military Journal*）的新生兒佈告中，詹姆士的女兒出生時，其軍銜為上尉。由此可知，詹姆士在舟山期間的軍銜為上尉，而與《中國叢報》中刊載的舟山官員名錄可知，馬德拉斯砲兵隊的統帥 J. Back 與詹姆士一樣，同為上尉，可見在駐舟山軍隊中地位不低，故而可說詹姆士能為仙尼華四編寫提供軍方的幫助。“Births, Marriages, and Deaths,” in *Colburn's United Service Magazine and Naval and Military Journal*, part 2 (London, 1843): 318; “Brevet,” *The London Gazette: The Appointed Organ for All Announcements of the Executive*, June 20, 1854, 1939-45; “Official Gazette: War Office,” *Allen's Indian Mail, and Register of Intelligence for British and Foreign India, China & All Parts of the East*, March 31, 1862, 240; “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Caton, Macao, Hongkong, Amoy, Fuchau, Ningpo, and Shanghai,” 16-17.

58 原文作“Shōnge Sing - Seasang”，推測“seasang”或為「先生」。《雜字文》中的「先生（A School Master）」泰盧固文“ஸிஓ ஸி”，轉寫後為“sim sā”。然《雜字文》中相關詞彙注音並不統一，如「置貨先生（Agent）」之生（ஸிஓ）為“sām”，「先一刻」之「先」（ஈ）為（sī）。在睦禮遜（William T. Morrison, 1835-1869）《彙解》中「先生（teacher）」

寧波的 Chew Haikoo。隨後是英文〈序言〉(“Preface”)，主要敘述本書的編纂目的、功用以及作者的個人信息。以上人物信息的考索，不僅是仙氏編寫與出版該書提供相應幫助的人物考證，更可以藉此一睹一位印度人在英國治下的舟山的交遊網絡的基本面貌。

在英文〈序言〉後，是中文〈序〉其目的主要是呼籲中國人把握時機，爭先學習英文用以經商，以及自署姓名與籍貫「天竺國嘛咿囉囉仙尼華四謹識」。⁵⁹ 在〈序言〉之後，是英、中目錄，各自列出了 72 門類 3193

一詞的寧波發音為“sin-sang”，與“seasang”十分接近，而今音作“ei sā”，故而從《雜字文》結合今音判斷“seasang”為「先生」存在一定可能性。又照福鈞 (Robert Fortune, 1812-1880) 對舟山的記錄，他提到當地人將洋人分作三等：Mandalees/Mandarin (官員)，Sien-sang，A-say。第二等的 Sien-sang，主要指的是商人 (merchants) 的尊稱，故而 Shōngē sing 先生更有可能是一位商人。第三等的 A-say，指的是普通的士兵，而普通士兵大量來自印度，該稱呼來自當地人對英文對話中的“I say”或是“Ay say”誤認為所屬階級，而該詞很可能為後來只流行於上海灘「印度阿三」源頭之一。參王汝良的〈「阿三」考〉，列述源頭有三，即上海灘巡捕地位排第三、上海洋涇浜英語、形容體貌與做派。而福鈞的描述，與第二種說法不謀而合，或許「阿三」在吳語區的興起，並非單一起源說可以涵蓋的。故而這位先生有三種可能，商人、市井文人或塾師。(印) 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51b、171b；(美) 睦禮遜 (William T. Morrison)，《字語彙解：羅馬字係寧波土話》(上海：美華書館，1876)，頁 473；湯珍珠、陳忠敏、吳新賢編纂，《寧波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頁 35；Robert Fortune,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including a Visit to the Tea, Silk, and Cotton Countries; with an Account of the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of the Chinese, New Plants, Etc.* (London, 1847), 73; 王汝良，〈「阿三」考〉，《東方論壇》2017.4(2017.8): 87-88。

59 「囉」字原文無「艸」部，「嘛咿囉囉」即「馬德拉斯」按照仙氏自序與瑪高濤的說法，仙氏並不擅長中文，故而「嘛咿囉囉」，故而反應了濃重的廣東特點，即以「口」部名詞翻譯地名。游汝杰在比較廣東方言與吳方言翻譯英文時，發現粵語方言字通常加上部首「口」，而上海方言字則沒有「口」部的特點，但秦右《上海話功課》(1850) 中的地名如「英唔利人」，加「口」是參考了廣東寫法。程美寶則進一步點明，粵字加「口」是表示外文的常見做法，其意在於加「口」在粵語中可以表示該字要以高聲調 (一般為上平聲) 發音。「嘛咿囉囉」之譯，或沿襲自廣東洋涇浜英語，該譯法可見羅氏《雜話》。到了《彙解》中作「麻打拉薩」(Madars)，寧波音為“Mô-tang-lah-sah”，去掉了「口」部，廣東英語的色彩開始消退。游汝杰，《方言接觸論稿》，

個詞彙。緊接目錄的是英文二十六大小寫字母與甬方言注音，並簡單提到元音（「主」）與輔音（「隨」）。隨後又以 14 頁（7 葉）篇幅羅列一些英文單詞組成部分的音節，諸如“ad/ 挨特”、“ba/ 排”、“de/ 地”等；及常用詞彙如“lend/ 冷脫，借”、“seat/ 西脫，交椅”、“book/ 泊壳，書”等。仙氏將上述部分稱之〈字類〉，如有漢字之部首。⁶⁰最後則是正文部分，每個門類下屬的詞彙皆由阿拉伯數字標注序號，方便查閱。正文頁以中文閱讀習慣，每頁平均分為 2（長）×3（寬）的六格。若有標題，則右側三格合併為一格。參照瑪高溫的介紹，每格最左側以漢字（寧波話）擬英文讀音，第二列是英文，再右側列是中文定義，最右側是以泰米爾語（Tami, 按：此為瑪氏觀點）與泰盧固語（Teloo goo）標記中文（即寧波話）發音（實際上幾乎都是泰盧固語）。瑪氏雖然讚賞仙氏的工作，但亦指出這類洋涇浜的教材學英語功效是有待觀察的——英語發音受限於漢字。他舉例，如“Spring”的發音為“Se puh ling”、“Lose”發音為“lo ho sze”、“Present”發音作“pa lih tsum yrh”等。⁶¹

瑪高溫在推薦信中還提及，《雜字文》在內容上存有大量錯誤，故除了從時代背景推測仙尼華四出版書籍時，英軍將要緊急撤退的背景外，另可以從文獻本身的錯誤看到出版的過程是相當倉促，未經細緻校對（存在校對流程）便匆忙開刻。其一，如中文目錄註明〈附有英華問答〉，⁶²但是成書卻無此部分。其二，英文致謝辭頁中的寧波作“Ningpoo”多出一個“o”，以致拼法並不統一。其三，內文部分，有缺譯、中英對譯錯誤、

頁 248；程美寶，《遇見黃東：18-19 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頁 170；（美）陸禮遜，《字語彙解》，頁 550；（英）羅伯聃，《華英通用雜話（上卷）》，頁 39a。

60（印）仙尼華四，〈字類〉，《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1a-7b；從現實角度考量，印度人存在唸英文字母清音不送氣的現象，由是，仙氏中英對音的主體音系可能受到此因素的影響與限制，瑪高溫也確實提到仙氏英文並不優秀的問題。但此說並不絕對，蓋因泰盧固語在塞音方面分清濁、送氣與不送氣，故而其所注寧波方言方面受到清濁與送氣與否問題的影響或許有一定影響。又因本研究核心議題不涉及此方面，故不展開論述。

61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August, 1847,” 989.

62（印）仙尼華四，〈目錄〉，《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2b。

重複錯位等疏失。如〈第八 說親門〉中的「出嫁」一詞，缺漏英文，卻有寧波話的英文注音「地鋸而物改鉄而」；〈第三九 國度門〉之「六部」與「宮苑」英文皆作“House of Lords”，而依照寧波方言注音「宮苑」為「拜力四福拉而四」，故英文當作“Palace of Lords”；〈第五五 音樂門〉第 22「花臉」之英文“A Buffoon”對應的甬方言注音「白天」，按慣例缺漏“A”之注音「也」；〈第六一 菓木門〉中的「香瓜」與「黃瓜」，對英文的寧波話注音依舊為「香瓜」和「黃瓜」；〈第六三 飛禽門〉中的「燕子」之寧波話注音為「燕子白而四」，依照前後文其英文卻缺漏“Bird（白而四）”；〈第六七 走獸門〉中的「狼」的英譯誤作“Lion”、「狐」亦錯書為“Bear”。⁶³ 其四，頁碼編排錯誤，如阿拉伯數字第 134 頁，正確頁碼應如中文葉「一百四十」相同，為 140 頁。歸根結蒂，造成這些疏失的深層原因，當是出於編者、校對者、中文助手等母語皆不相同所致，難以統合校對到中、英、泰盧固語及阿拉伯數字。

以上的疏漏，可隨著瑪高溫信件的發現而得到更全面的補充。按仙氏自述，隨著他學習計劃的展開，他可說些日常口語，但無法讀、寫。這一點，瑪氏亦有在信中提及其無法閱讀中文，乃至英文也難稱完美的問題。從而印證了相當重要的一點，而此點正是序言中沒有提及的——該書乃由仙氏自費出版，透露了書籍出版中的相當重要史料，也回應了前文選雕版印刷是為了經濟原因的推測。⁶⁴ 又從側面得知，瑪氏對該書出版事宜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乃至也存在直接或間接認識仙尼華四的可能性，並與羅伯聘共同構成複雜的交際網絡。⁶⁵ 進一步論之，《雜字文》中英詞彙齟齬的

63 (印) 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43b、180b、238a、266a、273a、269b。

64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August, 1847,” 989.

65 三人之關係可從如下因素管窺：一，此先被前輩學人忽略的祕密——《雜字文》與《雜話》之間存在緊密關聯，二者不僅序言文字大段雷同，就連擡頭格式、部分異體字、落款形式也頗為相近，故推測仙氏在編寫《雜字文》的過程中參考了《雜話》；二，從重疊的活動空間論，羅伯聘在任寧波領事前便供職舟山，二人熟悉的概率不小，何況羅氏任寧波領事，仙氏之雕版也在寧波進行，有相重合的活動圈。三，羅伯聘與瑪氏相識（瑪氏是羅氏遺囑見證人之一），故二人又可能通過瑪氏直接或間接觸。王宏志，〈生榮死哀：英國第一任寧波領事羅伯聘（Robert Thom, 1807-1846）的去世

狀況，側面體現了中文助手不通英文，而仙氏中文（寧波方言）或許聽、說尚可，但閱讀能力相當存疑。同時，綜合前文對出版史考索之結論表明，目前所見僅存的《雜字文》版本當為初印本，故而存有部分疏漏還未曾校改，印刷數也有限，再結合動蕩的時代因素，使得存世數量較為稀缺。

四、龍、獅、象對話的橋樑：泰盧固語拼寫寧波土白系統

若論《雜字文》的最突出的價值，或者說是其獨一無二的特色，乃是它的注音系統，而非只有簡單記錄舟山或寧波地區詞彙、文化，或者是早期英漢對譯的尋常價值。按趙力的研究，在甬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尤重寧波土白，早年依賴口耳相傳，導致教士抵甬後數年，依舊難以掌握寧波土白。長老會雖與其他修會通力合作，先後發明兩套系統來幫助教士學習寧波方言——羅馬字拼寫寧波土白、漢字拼寫寧波土白。前者肇端於 1850 年代，後者興起於 1860 年代。⁶⁶ 但趙力卻忽略了寧波土白注音系統化的開端，其實是 1846 年由仙尼華四在舟山所開創的泰盧固語拼寫寧波土白系統，及摻雜少量羅馬字拼寫寧波土白成果。確切說，《雜字文》是由泰盧固語拼寫寧波土白系統，與寧波方言拼寫英語系統組成的雙系統注音教材。故而十九世紀寧波話的注音系統實際上有三個系統，即由 1840 年代英國軍政府官員仙尼華四在舟山開創的泰盧固語拼寫寧波土白系統（部分詞彙具有羅馬字拼音）、在甬美長老會在 1850 年代開創的羅馬字拼寫寧波土白與 1860 年代興起的漢字拼寫寧波土白系統。

泰盧固文注音的意義，在於幫助還原 1840 年代的寧波方言語音舊貌，揭示近代寧波方言的語音演變，其價值實可與同時代的長老會羅馬字拼音比肩。馬德拉斯作為英國統治印度的三大總督區，長期是英國維護在亞洲利益的核心基地，且東印度公司在政策上尤為注意學習貿易地區的語言，

及有關其撫卹安排的討論》，《或問》37(2020): 13。

66 在新教傳教士內部，使用直音法來注音，確實具有開創性。而直音法本身是相當初階的注音方法，已熟悉的相近的讀音來記錄另一個字的讀音。在中國反切興起前，「某」字「讀若某」是常見的注音方法。趙力觀點見：趙力，〈「外邦人的唇舌」〉：54-57。

馬德拉斯地區的泰盧固語也早為英國學者關注，將之作為馬德拉斯執政者的必備語言。⁶⁷ 露密士便曾提及舟山一位來自都柏林的 S 上尉 (Captain S)，該上尉曾在東印度公司工作，他便能說馬德拉斯地區的語言。⁶⁸ 且在仙尼華四到達舟山之前，已經有相當數量之泰盧固語轉寫的英文研究成果。⁶⁹ 前文已及，在十九世紀初，東印度公司開始重視泰盧固文教育，當地部分英國人可以閱讀泰盧固文。換言之，《雜字文》當中所有的泰盧固文注音，在當時即可全部轉寫為拉丁字母，且駐舟山英軍中有很大比例的印度軍人與少部分英國人可以按泰盧固文發音寧波話，這是寧波府城的洋人無法做到的。同時，泰盧固文擬音與傳教士文獻相似，聲調的狀況未得以記錄。

茲擇取《雜字文》詞彙 10 例，轉寫其泰盧固文注音，並將之與《彙解》與今音對比，以彰《雜字文》除保留舟山詞彙意義外，在語音方面也有開創、輯佚、互校等方面的價值，如下表二：

67 學習貿易地區語言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政策之一，如東印度學院成立 (East India Company College) 後，被派往印度的總督至少需要掌握兩門以上的東方語言，馬德拉斯總督區書記需要學習梵文和泰盧固語。游博清，《經營管理與商業競爭力：1786-1816 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臺北：元華文創公司，2017)，頁 36、52。

68 Loomis, *Scenes in Chusan*, 41-42；此後，露氏在 1849 年擔任寧波華花聖經書房主任。蘇精，《鑄以代刻》，頁 311。

69 在印度，如亞歷山大·鄧肯·坎貝爾 (Alexander Duncan Campbell, ca. 1786-1857) 1816 年在馬德拉斯首府聖喬治堡書院 (College of Fort St. George) 出版的《泰盧固語語法》(*A Grammar of the Telooogo Language*) 一書中，第一章〈泰盧固語字母〉(“Telooogo Alphabet”) 中就有分析泰盧固語字母的發音問題，元音與輔音皆有對照的英文字母發音，如元音“ᳵ”為“i”。坎貝爾是蘇格蘭在印公務員，對泰盧固語頗感興趣，其教材史為聖喬治堡學院學習的印度公務員新人 (I.C.S. recruits) 編寫的。在英國赫特福德郡 (Herts) 的東印度公司學院，同時代的東方學系 (Oriental Department) 中，由語言學家法蘭西斯約翰遜教授 (Francis Johnson, ca. 1795/96-1876) 講授梵文與泰盧固語。Alexander Duncan Campbell, *A Grammar of the Telooogo Language, Commonly Termed the Gentoo, Peculiar to the Hindoos Inhabiting the North Eastern Provinces of the Indian Peninsula* (Madras, 1816), 3；坎貝爾的簡介見：Klaus Karttunen, “CAMPBELL, Alexander Duncan,” *Persons of Indian Studies* by Prof. Dr. Klaus Karttunen, Who Was Who of Indian Studies, updated April 2024, <https://whowaswho-indology.info/1161/campbell-alexander-duncan/> (accessed October 12, 2022); F. Clark, *The East-India Register and Directory, for 1839* (London, 1839), xvi.

表二 《雜字文》詞彙注音與睦氏注音、今音比較舉隅表⁷⁰

序號	《雜字文》詞彙及其泰盧固文與轉寫	《字語彙解》注音	今之讀音
1	菩薩 (頁 1a) : బు సా ⇒ bū sā	bu-sah (頁 407)	bu sa? (《崔》頁 57) bu se? (《現》頁 43)
2	哭 (頁 36b) : ఖా ⇒ khā	k'oh (頁 525)	k'o? (《現》頁 345)
3	屋 (頁 59a) : ఒ ⇒ o	oh (頁 510)	o? (《崔》頁 593 ; 《現》頁 347)
4	簷下 (頁 61b) : యిం ఒ ⇒ yīm o	/ (簷 : yin ; 下 : ô [頁 141、251])	/ fi fio (《崔》頁 658、611 ; 《現》 頁 40、104)
5	石 (頁 66a) : స ⇒ sa	zah (頁 36)	za? (《崔》頁 443) se? (《現》頁 314)
6	硬泥 (頁 67b) : నానీ ⇒ nā nī	/ (泥 : nyi [頁 53] /Clay, na-nyi 坭 [頁 76])	/ ni (《崔》頁 405) 淖泥 : na ŋi (《現》 頁 61)
7	晝 (頁 72b) : వో ⇒ vo	wô (頁 433)	fuo (《現》頁 121)
8	椀 (頁 75b) : వీణ ⇒ vīū	un (碗, 頁 357)	u (《崔》頁 583 ; 《現》頁 248)
9	奶 (頁 122b) : నా ⇒ nā	na (孃, 頁 48)	na (《崔》頁 400 ; 《現》頁 61)

70 《崔》指崔山佳之《寧波方言詞語考釋》，《現》指湯珍珠等之《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寧波方言詞典》。泰盧固語轉寫來自查爾斯·菲力普·布朗 (Charles Philip Brown, 1798-1884)《泰盧固—英語詞典》(A *Telugu-English Dictionary*) 的電子詞典，底本為：Charles Philip Brown, *A Telugu-English Dictionary: New ed., thoroughly rev. and brought up to date*, 2nd ed. (Madra, 1903)。本文中的轉寫又參考美國教育部資助的

序號	《雜字文》詞彙及其泰盧固文與轉寫	《字語彙解》注音	今之讀音
10	塔 (頁 152b) : 𑖇 ⇒ tha	t'ah (頁 330)	t'eʔ (《現》頁 307)

從上表，可以藉此一窺寧波方言近代以來的音系演變起點的語音狀況。

雖然寧波府內各邑、不同地區發音本就有所差異，演變進度也並不一致，以及還存在編者誤聽、二語語音感知、泰盧固文擬音精確性以及轉寫後的偏差問題。⁷¹但《雜字文》在記載語音演變方面的證據已然顯露，可用作研究十八世紀四十年代的寧波方言語音的趁手新工具。依民國《定海縣志》〈方言〉所言：「蓋海禁開放以後……寧屬七邑，鄞、慈、鎮自成一音系，奉、象、南又自成一音系，定海則得鄞系十之八九，而得奉系十之一二也。」⁷²定海方言在海禁開放前幾乎以寧波府首縣的鄞縣音為主，自鴉片戰爭以來，受到其他地區的語音影響而產生了明顯音變，是故《雜字文》記錄定海在鴉片戰爭期間肇開海禁時期的語音價值不可取代。就此進一步需要論證的前提，是泰盧固語注音是否基本可靠的問題，這可以從吳語語音的部分特點進行考察。如「打」字讀「德冷切」，即「打」、「冷」

「南亞電子辭典」：「A Telugu-English Dictionary: Charles Philip Brown (1798-1884),」 Digital Dictionaries of South Asia, Digital South Asia Libra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pdated October 2023, <https://dsal.uchicago.edu/dictionaries/brown/> (accessed October 2022). 此外，轉寫後的元音附加符號如 “ā”，表長元音 /a:/；“ñ” 為鼻音，有 /m/、/n/、/ɲ/、/ɳ/、/ŋ/ 等可能。

71 胡方提及研究寧波方言百年語音演變的重要傳教士文獻（《彙解》、《音節》、《手冊》、《寧波土話初學》）記音體例一致，有明顯的師承關係。袁丹亦在此基礎上，指陳傳教士記音會受到二語感知的影響，記音處理上也與後世方言學者有所差異，故而研究寧波方言語言演變時，不能全然依賴傳教士之記音。仙尼華四的注音也有相當相似的狀況，此為藉助仙尼華四注音研究寧波方言需要留意之處。考慮到泰盧固語語音在百年後也會發生變化，故而採用之轉寫基本來自二十世紀初的方案（IPA 則屬於當代的成果），盡量靠攏當時的發音，有疑者，可與韻書、同時代傳教士成果相互驗證。故而研究域外文獻，須以本土文獻為依歸，二者結合以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胡方，〈試論百年來寧波聲母系統的演變〉，《語言研究》2001.3(2001.9): 65-66；袁丹，〈從傳教士文獻和現代方言再論百年來寧波方言的聲母系統的演變〉，《東方語言學》2015.1(2015.6): 100。

72 陳訓正、馬瀛，〈方言〉，《定海縣志》第 5 冊，頁 2a。

二字同韻，是吳方言的獨有語音特徵，故以此為標準來檢驗《雜字文》——可發現「打」被記為“Tān (ㄊㄢ)”，「冷」被記為“Lān (ㄌㄢ)”，二韻極類似。⁷³ 由此可見，《雜字文》的泰盧固文注音系統經過初步檢驗稱的上是大致可靠，具備學術研究之價值。

在確認《雜字文》的泰盧固文注音系統具備研究 1840 年代寧波方言語音的學術價值後，下文將通過數個案例來展示《雜字文》的具體價值與巨大研究潛力。⁷⁴ 徐通鏘曾指陳，在鴉片戰爭後，寧波開埠，加強了寧波與北方方言間的相互影響，使得北方方言在寧波方言中的影響力日益加深，產生新的文讀音。所以寧波方言向北方方言靠攏有幾個重要的時間層次，三個時間段至關重要——鴉片戰爭前的無文白異讀（新文讀），與鴉片戰爭後至「五四／國語運動」前的文白異讀並存時期。⁷⁵ 若將《雜字文》

73 “ㄢ”與寬泛的鼻音符號“ㄛ”之區別，在“ㄢ”於泰盧固語中的讀音為 /n/。「打」有時在詞尾時（如「劈面打」），注音為“Tān (ㄊㄢ)”，僅是元音的細微差別，韻基本不變。李小凡、項夢冰編著，《漢語方言學基礎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84-186；（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244a、6a、183b。

74 因本文主要處理的主要議題是《雜字文》的學術價值重新發現，故而本節僅通過幾個案例進行展示，以證明其確實具備方言語音學研究之價值，具體的語音學價值有待進一步專文研究。

75 本研究討論之文白異讀，主要承續徐通鏘關於寧波近代語音的討論。寧波方言的文白異讀，或者說北部吳語的文白異讀現象，在近代以前已然存在，如仇廷模（生卒年不詳，1711 年舉人）所著《古今韻表新編》，在很大程度上反應了康雍時期的寧波方言語音，在其筆下，已然有文白異讀的明確記載，如討論日母時，注曰：「俗音與疑聲同」，即言彼時寧波方言日母文讀 /z/（文讀與禪母同），白讀與疑母一致，讀為 /ŋ/（平田直子認為擬 /ŋ/ 更適宜）；且第十音的禪 / 邪 / 神母與第九音從母 /dz/（或 /dʒ/），在那時的界限已經開始相混——「又按世俗神聲字，固不專屬第九音，而禪聲字，又或又似九音者，正類從邪二聲亦然」。又若談到幫系聲母時，注云：「其微聲，吳越間俗呼，尚同明聲，如亡、無、文、萬，讀作芒、謨、門、慢之類，蓋元音也。」意即，微母白讀音同中古明母 /m/。《古今韻表新編》的聲母系統，可參平田直子之擬音。進一步論，近代以前寧波方言的文讀與近代新文讀相較，其來源有所差異。如陳忠敏研究吳語古從邪崇船禪聲母文白異讀現象時，將文白異讀氛圍三個層次，依次為白讀層、文讀層與新讀層，並指出上述五母相關字音白讀為擦音，文讀為塞擦音，其來源並非北京話，而是源自宋時杭州話，並隨著宋室衰微而衰退。新文讀的擦音，

結合《彙解》及後續的方言文獻，可以完整串聯起來鴉片戰爭以來的寧波方言的語音的百年變化歷程，打破了曾經因缺乏語音材料而對鴉片戰爭時期僅能猜想而不能驗證的困局。如可考證徐氏所言鴉片戰爭時期整體文讀替代白讀過渡期的演變狀況，故其珍貴程度當不下於《彙解》等文獻——《雜字文》正乃徐氏推測近代文白異讀肇起時期之記錄，《彙解》隸屬中期，穆麟德的《寧波方言音節》(*The Ningpo Syllabary*, 1901)、《寧波方言手冊》(*The Ningpo Colloquial Handbook*, 1910)、《定海縣志》〈方言〉(1924)則是晚期。⁷⁶此外，泰盧固文注音系統的存在，還增加了與傳教士注音系統互證的功用——方言語音研究者面臨羅馬字注音體系因二語感知等原因導致的某些記音／注音爭議時，還可以藉助《雜字文》進行更多元的論證。

從近代文白異讀發展的角度切入，於韻的改變一項，徐氏提出，雖然文白競爭的趨勢是通常以文讀勝出，白讀退出交際領域，但如「拜」等詞則是反例——文讀 /ɛ/ 反而在與白讀 /a/ 競爭中落敗，這一現象也可以藉《雜字文》進行考辨。泰盧固注音中，「拜堂」、「禮拜日」之「拜」，「排陣」之「排」，「樹牌」之「牌」，「統買」、「買辦」、「包買」、「官買」之「買」、「賣就」、「叫賣」、「賣實」之「賣」，「帶扣」、「鞋帶」、「襪帶」、「綉帶」之「帶」、「老太婆」、「太公」、「太婆」之「太」，「奶」，「芋艿」之「艿」、「玉／金／銀方戒子」之「戒」、「揩布」之「揩」等諸多徐文中使用之案例，仙氏僅記有白讀音 /a:/，惟「解渴」之「解」記作 /a/，但二者都屬 /a/ 類，基本未見文讀音 /ɛ/ 類的記載。⁷⁷再考之《古今韻表新編》，與吳善述 (?-?)

來自古邪船禪三母，源自北京官話的滲透。這一點，在《古今韻表新編》上有一定的反映，即擦音的邪禪二母與塞擦音的從母之間邊界開始模糊。清·仇廷模，《古今韻表新編四卷後一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219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頁 239、240；(日)平田直子，〈《古今韻表新編》的音系〉，收入上海市語文學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合編，《吳語研究：第三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 163-170；陳忠敏，〈吳語、江淮官話的層次分類——從古從邪崇船禪諸聲母的讀音層次為依據〉，《漢學研究》36.3(2018.9): 298-309；徐通鏞，《徐通鏞自選集》(鄭州：大象出版社，1993)，頁 59-64。

76 徐通鏞，《徐通鏞自選集》，頁 22。

77 (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44b、159a、161a、197b、163a、

《二十三母土音表》(1836)，上述大部分字於《古今韻表新編》為哈、海、代韻之開口呼，主元音為 /a/；《二十三母土音表》中，則多屬灰皆韻開口呼，主元音依舊為 /a/。⁷⁸ 如此可以在較大程度上支持徐氏之判斷，即鴉片戰爭期間的寧波，這些字的 /ɛ/ 類新文讀可能還未興起，而至教會拼音如《彙解》時，隨著北方方言的影響加劇，已經出現了 /ɛ/ 文讀音的記錄。

再考察聲母，如以日母字之「日」為例，徐氏提到《彙解》之記錄聲母有白讀 /ŋ/ 與文讀 /ʒ/ 之別。參《古今韻表新編》，日母有文白二讀早有明論：「若夫日母有兩音，《集韻》從雅附禪，亦宜。」即平田直子所擬文讀音 /ʒ/ 與白讀音 /ŋ/，也即日母與禪邪，或與從、泥（娘）、疑、喻三合流。⁷⁹ 察《雜字文》，「日」的讀音 /ʒ/（ㄗ類，如「日」、「日光」、「日升」、「日蝕」、「一日」〔ㄗ〕、「日常」〔ㄗ〕）、/ʒ/（ㄗ類，如「度日人」）大多接近文讀音（從發音部位來說，更接近文讀音的 /ʒ/ 或 /ʒ/，二者僅清濁之別），白讀音 /n/（ㄋ，如「禮拜日」）的記錄反而較為稀見。至《彙解》時期，大部分的文讀音，已經變為白讀“ny”，如「一日」、「日光」、「禮拜日」，「日蝕」（“jih”）依據保持了文讀音。⁸⁰ 可見，文白讀的演變並非整體的，而是各自發展的。再如微母字之「尾」在《雜字文》中僅收錄文讀音“vi（ㄨ）”——「尾星」、「雉尾」、「曲尾」，而《彙解》則記錄白讀“mi”（如「尾巴」）與文讀“vi”（如「從頭至尾」）二種。⁸¹ 又若微母字之「文」，多為文讀音“v（ㄨ，/v/）”（如「天文門」、「祝文」、「文官」、

172a、172b、162a、163a、137b、139a、139b、16a、42a、122b、265b、143a、136b、122b；徐通鏘，《徐通鏘自選集》，頁 60-62。

78 清·仇廷模，《古今韻表新編四卷後一卷》，頁 182、216-217；（日）平田直子，〈《古今韻表新編》的音系〉，頁 167；清·吳善述，《二十三母土音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四年〔1878〕四明黃祥黼補不足齋刻本），頁 2b；張凱，〈《二十三母土音表》及其反映的 200 年前的寧波方音〉，《語言學論叢》2021.1(2021.6):168。

79 清·仇廷模，《古今韻表新編四卷後一卷》，頁 239；張凱，〈《二十三母土音表》及其反映的 200 年前的寧波方音〉：160-161。

80 （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2b-3b、293a、293b、62b、195a；（美）睦禮遜，《字語彙解》，頁 108、273、463、141。

81 （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4b、274a、239b；（美）睦禮遜，《字語彙解》，頁 519、480。

「印稅文書」、「一文」)等,幾乎未見白讀,而《彙解》則文官、天文、文書等詞依舊保持文讀音“v”。⁸² 微母白讀作中古明母之讀音,在《古今韻表新編》中已有明確的反映,且微母文讀音 /v/ 屬舊文讀,並非鴉片戰爭以後產生的新層次文讀。但近代以來,「尾」、「文」等本在雍正時期的普遍使用的白讀音,在近代以來被文讀音大量取代,成為寧波方言近代發展的特徵之一,也符合文讀取代白讀的普遍趨勢。以上案例亦說明,藉助域外文獻,可以在實例層面上補充古代韻書的局限。最為特殊的是,《雜字文》記錄的語音,似乎官話色彩較後來《彙解》等文獻更為突出,如古微母字不讀 /m/, 古日母字不讀鼻音,皆是官話的語音特點,這些特點在《彙解》中並不突出。⁸³

徐氏論證之憾在於缺乏確切文獻證明鴉片戰爭時期文白異讀之具體狀況,現從上例可見,《雜字文》確實為此猜想提供了有效證據。是故《雜字文》的價值在為考察鴉片戰爭時期寧波方言的語音種種猜想提供了實際且緊要的文本證據,具備考察文讀起源的價值。又可推導仙氏接觸到的寧波方言(舟山地區)的文白異讀現象之因是自由港開闢,各地商人雲集,文白競爭的現象已經出現,其次側面論證操著文讀的仙氏中文助手身分當為文人(即「先生」)。

進一步觀之,在《雜字文》3193 個詞彙中還潛藏著另一項具有開創性價值的內容。《雜字文》因為初次語言接觸,面對異文化而產生不可譯的困難時,尤其是收錄之花草蟲魚鳥獸之名,他採取的辦法是藉羅馬字來擬音。雖然,仙氏的羅馬字注寧波音尚未形成系統,但毋庸諱言,《雜字文》確實是目前可見最早記錄且頗具數量的羅馬字拼寫寧波方言詞彙的例證,且這類名物專有名詞詞彙多是傳教士未曾記錄的,大大增補了十八世紀上半葉寧波方言詞彙的發音狀況。茲將相關詞彙列舉如下,「蜻子, Chinohoo Snail, 蜻子四耐而」(其後之例僅保留羅馬字發音與中文)、「橄欖 / 青菓, Chinkō」、「杏子, Aintoo」、「李子, Lěhoo」、

82 (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1a、44a、182a、259b、305b;(美)睦禮遜,《字語彙解》,頁 319、413、83。

83 李小凡、項夢冰編,《漢語方言學基礎教程》,頁 114-120。

「牡丹，Manthat」、「芍藥，Saiyah」、「丹桂，Thankoye」、「通草（花），Chongchah」、「麒麟，Qheeling」、「獅子，Soohoo」、「鳳凰，Ongwhoa」、「孔雀，Kongcheă」、「鴛鴦，Ianguū」、「喜鵲，Scheekca」、「烏鴉，Wooyah」、「燕子，Yeenchoo」、「麻雀，Moacheah」、「百舌，Pashee Bird」、「畫眉，Oamini」、「蛤蚧，Kalse」、「螺螄，Losoo」等。⁸⁴ 以上「鳳凰」、「鴛鴦」諸詞，部分未收入陸禮遜《彙解》，足證《雜字文》對教會羅馬字拼音的補充意義。

又，仙氏無法英譯「麻雀」等詞，首先反映其作為非英語母語者的語言能力的不足。與之相對的，陸禮遜將之譯作“SPARROW, mô-tsiang' 麻雀”。⁸⁵ 但是，仙氏無力翻譯的詞彙，既有輯佚的價值外，卻可另覓價值，尋獲寧波方言的語音演變的書證。⁸⁶ 對於「雀」的語音百年變化，徐通鏞在討論「鴨」(ɛ)類詞兒化問題時，一併談到伯類詞的類似狀況，指出並非是以單純的文白異讀足以解釋此類語音現象，而是出現了類似「兒化變音」的出現到消失的過程，是表達親暱的小愛稱。目前，寧波話已經不產生新的兒化，且在晚清以來的城市化進程中兒化韻與其他陽聲韻尾弱化後逐漸消失。如「麻雀」的發音實際上是「麻雀（兒）」，乃是「雀」的變音——雀本音 /tsiaʔ/ + 兒 /ŋ/。⁸⁷ 在民國《定海縣志》〈方言·變音表〉中，「雀」之讀音有「ㄗ一ㄩˊ」、「ㄗ一ㄩˊ」二種，後者“ziang”主要為「麻雀」之讀音。⁸⁸ 而《雜字文》對此的英語擬音為“Moacheah”，泰盧固文轉寫讀音為“mo-tswa”，⁸⁹ 與兒化殘留現象相悖，反而接近本音與如今的舟

84 (印) 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279a、262a、266b、267a-268b、272a-274a、279a。

85 (美) 陸禮遜，《字語彙解》，頁 443。

86 可參徐通鏞(1931-2006)之〈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附論音變規律的三種方式〉，然徐氏材料之上限為 1876 年《彙解》，較《雜字文》遲了三十餘年，故而《雜字文》對考察寧波音系演變意義非常關鍵，將時間從 1860 年代上推至開埠初期的 1840 年代。徐通鏞，《徐通鏞自選集》，頁 22。

87 徐通鏞，《徐通鏞自選集》，頁 81-86。

88 陳訓正、馬瀛，〈方言〉，《定海縣志》第 5 冊，頁 11a。

89 (印) 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273a；該詞的轉寫受到了賓州大學南亞學系 Afsar Mohammad 博士的幫助，在此特申謝悃。

山讀音 /mo tciā/，鼻音殘餘在其他語言的衝擊下一度早於府城被弱化。類似的情況還有「喜鵲 (Scheekka)」，已然失去了鼻音韻尾，在《定海縣志》中，則記錄文讀與城廂讀音為“qia (◁一丫)”，鄉間白讀“qiang (◁一尤)”尚存鼻音殘留，《雜字文》的讀音無疑接近文讀而非白讀，說明至少在 1840 年代的舟山，已然出現了鼻韻尾消失現象。⁹⁰ 如上案例可作為修正徐氏部分說法之反例——「兒化的殘存形式就是這樣一個個地、一步步地走向消失，寧波比定海消失的快」，⁹¹ 或許可以證明英國人占領時的自由港時期的舟山定海比寧波府城對外文化交流更加頻繁，產生了這樣一個特殊的、大量語音交流與接觸的時段。

而大部分情況則屬於的正例，如「鴉片」之「鴉」，《雜字文》為“am (ㄞ〇)”，尚有兒化殘餘，而到了《彙解》已經變為“a”，《定海縣志》則保存三種讀音，「鴉片」之「鴉」亦已讀成“a (丫)”；再若「鴨」，《雜字文》讀“am (ㄟ〇ㄞ)”，《彙解》記為“æn”，《縣志》則開始記錄文讀音“a (丫)”與白讀音“an (ㄋ)”，今日之發音為“ɛ”；又如「茄」在《雜字文》中作“jam (ㄟ〇ㄓ，/dʒa:ŋ/)”，與《彙解》之“gyiæn”、《縣志》之“qan (ㄋㄋ，白讀，文讀為 qia)”，韻大體不變，聲母向舌面音發展。⁹² 以上案例，論證了各詞彙鼻韻尾消失的速度並不一致，有的詞彙至《縣志》時期還有所保留（如「鴨」），有的在《彙解》時期就已經開始消失（如「鴉〔片〕」），幸得《雜字文》有所記錄。足見，《雜字文》還具備記錄與考察寧波方言兒化殘留的語音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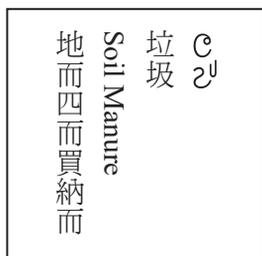
此外，在英國人統治前，舟山作為浙江海上一隅，語言接觸的機會相對較少，而 1846 年代前後，鴉片戰爭導致寧波開埠以及維持數年的舟山自由港時代，使得《雜字文》保留了該特殊時期吳語—英文接觸、官話接觸初期的詞彙與語音面貌。再舉一例——在當下發音中，「垃圾」按照

90 (印) 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273a；陳訓正、馬瀛，〈方言〉，《定海縣志》第 5 冊，頁 11。

91 徐通鏘，《徐通鏘自選集》，頁 86。

92 (印) 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111b、273b、124a；陳訓正、馬瀛，〈方言〉，《定海縣志》第 5 冊，頁 11；(美) 睦禮遜，《字語彙解》，頁 367、138、143。

崔山佳記錄的寧波方言發音為“la ɛ”，⁹³當是受到了普通話的影響。在《雜字文》中「垃圾」作：



泰盧固文“ఁఱ”轉寫後讀音為“la se”，其發音可與《彙解》相互印證——「GARBAGE, K'a-dong-leh-she' 界°洞垃圾」。⁹⁴明顯，垃圾一詞的原始讀音“la se”，面對早年強勢的上海音演變為與現代普通話時處於弱勢低位，其讀音遷移自上海音並被普通話所加固，一路從“la se”演變為“leh she”，最終變成“la xi”。⁹⁵且《雜字文》中的英譯“**Soil Manure**（土肥）”相較於《彙解》中的“**garbage**”更貼合本意，即《國語辭典》中的「垃圾」釋義「lehseh，吳語，穢物與塵土相混積之稱」，⁹⁶而“**garbage**”在當同時代的英語字典（*A New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844）中意涵為「需要被清潔之物」（即穢物），⁹⁷可以說《雜字文》為吳語與英語翻譯在詞彙方便，保留了接觸初期翻譯建立等值關係的嘗試。

93 崔山佳，《寧波方言詞語考釋》（成都：巴蜀書社，2007），頁 325。

94 （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255a；（美）睦禮遜，《字語彙解》，頁 196。

95 汪化雲點明，「蠟塞」才是寧波的本音，念「垃圾（/la²¹³⁻²²ɛ⁵³/）」是被上海話影響，而忘記了舊音。上海的原本狀況是，上海舊音為 /laʔ saʔ/，然而新上海作為移民城市，來自蘇、甬的移民讀音雖然相近、但音質不同，導致人們不便學習，故而產生依託漢字望形生音而讀作 /la¹³ɛ³⁴/，積非成是後成為新上海方言。汪化雲，〈「垃圾」的讀音〉，《語言研究》33.2(2013.12): 93-94。

96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國語辭典》第 2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3），頁 970。

97 Charles Richardson, *A New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1844), 335.

同時，泰盧固文與羅馬字兩套注音系統並存，還可達到對部分詞彙發音互相糾錯與驗證兩套注音差異性的功用。雖將仙尼華四的羅馬字寧波拼音與泰盧固文注音轉寫對比可發現二者不完全相合，但可謂近似。如「畫眉」之泰盧固文注音“వి వైం”，轉寫後作“*Eo eaim*（即：*O aim*）”，而仙氏英文標音作“*Oamini*”；「螺螄」之“ఱి సు”轉寫為“*lo su*”，而仙氏英文英譯為“*Losoo*”；「地蚕」之“డి జై”轉寫成“*dī jai*”，而英文英譯作“*Deezaii*”，而陸氏《彙解》，則作“*di-zen*”⁹⁸。繼而參今《寧波方言詞語考釋》記錄之「螺螄」為讀音 /s? ləu/，《寧波方言詞典》「地蠶」去聲調則作 /Dizəi/。⁹⁹ 從以上二詞而言，即便因泰盧固語字母本身發音之限制，會對寧波方言注音產生一定偏差，然比較仙氏的羅馬字拼音與泰盧固文注音可發現，二者的差異甚小，可謂敵體。故而可以合理推測仙氏注音時，應當考慮並向中文助手實踐過泰盧固語發音相關詞彙，應當不致出現通過泰盧固發音達到寧波方言無法辨識的狀況。以上雖然只有寥寥數詞，但也是明確例證，故而應當將羅馬字拼寫寧波方言時間從在甬新教傳教士提早至 1846 年。仙氏的羅馬字拼音雖然不似泰盧固文未成系統，但他確也是羅馬字拼寫寧波方言教材方面第一人。

括而言之，《雜字文》的語音系統具備研究鴉片戰爭時期寧波方言語音演變方面，如輯佚、校正、文白異讀緣起與發展檢視、兒化殘留考察、語音原貌發現等關鍵語音價值。此外，從徐通鏞所論之寧波近百年語音演變的角度切入，鴉片戰爭以後的寧波方言，大概率存在十餘年內部分口語語音變化的現象，而且《雜字文》時期的寧波方言（舟山地區），官話色彩較以往乃至今後濃重。據此猜測，鴉片戰爭之後，寧波（尤其是英國占據時期的舟山地區）與北方地區的人口流動日益頻繁，經歷的語言變化的

98 （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274a、279a、279b；（美）陸禮遜，《字語彙解》，頁 140。

99 吳語保留濁音，「地」在中古音中讀定母，近代音中讀端母，但吳語依舊讀定母。此案例展示了泰盧固語因其輔音本身分清濁，故而在處理吳語濁聲問題上，具備相對的優勢。如果要進一步考察寧波方言的清濁音演變等問題，則需要比較二種語言的輔音體系，需將來專文處理。崔山佳，《寧波方言詞語考釋》，頁 516；湯珍珠、陳忠敏、吳新賢編纂，《寧波方言詞典》，頁 22、170。

速率就越快，最直觀的就是體現在語音演變方面，這種人口流動引發的語言接觸變異現象值得進一步探索。

五、結 論

《雜字文》成書背景位處英語教材萌芽期向發展期過渡時期，且是寧波土話與英文語言接觸初期的教材，帶有濃重的萌芽期的洋涇浜特徵。然觀看《雜字文》，絕非簡單的洋涇浜英語教材可以涵蓋，它具有不可替代的語言學、歷史學與文獻學的價值。而本文之考證與分析並非面面俱到，但希冀達到拋磚引玉之效，引起學界對此文本的更多關注。就重新確立《雜字文》價值，宜從如下三個層面率先予以思索。

首先是對成書時間、地域與作者背景的認知。按英文序言結合格林任職時間，可推測仙尼華四編寫《雜字文》的時間可能在 1843-1845 年之間，雕版開刻時間約在 45 年末與 46 年初之間。而作者之所以有能力編纂此書，與其出身有莫大關聯——其出身地馬德拉斯的文化、貿易與軍事重鎮的背景，以及其擅長語言、文書與會計的種姓背景，無疑都是其編寫三語詞彙書的先決條件。若非考察印度史與印度文學史，將會長期偏廢。

又，就書籍史而言。《雜字文》按瑪高溫的推薦信，該書乃由仙氏自費出版，故其基於經濟與便捷角度考慮，選擇了傳統雕版印刷，而非西式活字印刷，以期靠低價售給溫飽線以上的中國家庭或是印度軍人、隨軍、其他群體與學術機構等，或許還有認識泰盧固文英國人，以達到基礎對話（寧波話語英文）與識字（英文、漢字）之效果，並依照銷量可以隨時加印。但是隨著舟山回歸清廷，該書並未加印，以較少的印刷量，卻也完成了在世界範圍內的流動的壯舉。同時，該書在漢學書目與中文學界的西方書目未曾斷絕，對於其影響力與流傳程度低的評判有待重新檢視。

最末，該書的核心價值與獨特性——採用泰盧固語拼寫寧波土白系統與寧波方言漢字拼寫英語系統組成的雙系統注音教材，具有記載鴉片戰爭時期寧波方言讀音、補足傳教士未曾記載詞彙讀音，以及驗證近代史以來寧波語音演變部分猜想所必須倚重的文獻。甚至，通過中、西乃至南亞語文獻——綜合仇廷模《古今韻表新編》（早於 1737）、吳善述《二十三

母土音表》(1836)、仙尼華四《雜字文》(1846)、一系列在甬傳教士所編羅馬字注音寧波方言聖經(1850s-1860s)與其他寧波方言成果(如《寧波土話初學》等,1850s-1860s)、陸禮遜《字語彙解》(1876)、穆德麟《寧波方言音節》(1901)與《寧波方言手冊》(1910)、《定海縣志》(1924)、《鄞縣通志》(1935-1951),以及現代方言研究成果等,可以完整串聯起並綜合考察寧波方言近三百年的語音演變。

不可否認,《雜字文》存在一定瑕疵,但該書已具校稿過程,以見作者試圖以嚴謹作品待之,無奈時局動蕩需要加緊出版,作為初印本,這些錯誤多在出版容錯之內。《雜字文》作為鴉片戰爭時期英屬殖民政府對殖民地區知識調查的成果,不僅具有方言研究的獨特價值,將來可以藉副文本、作者意圖、後殖民等角度開拓歷史學與文化學的新價值,更是毫無異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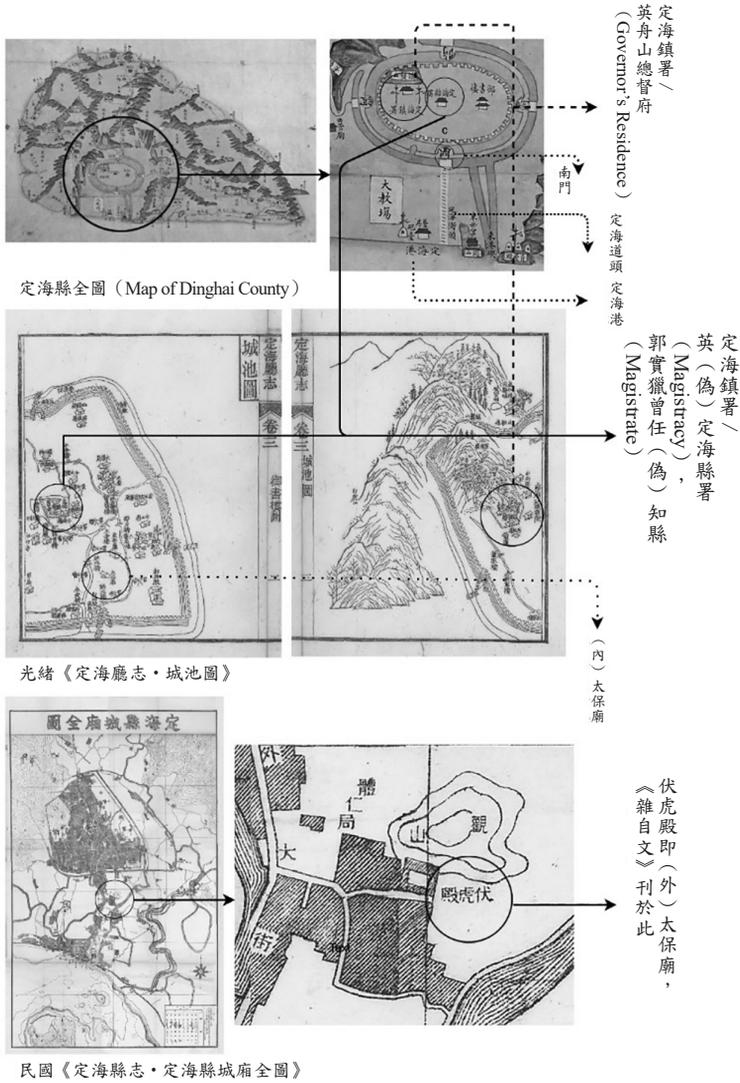


圖一 四版《雜字文》及同時期羅伯聃著作的裝幀



圖二 五版《雜字文》的內容¹⁰⁰

100 以上書影(包含前註)均已獲得澳洲國家圖書館、大英國圖書館、羅格斯大學東亞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的版權複製許可。



圖三 定海外太保廟及軍政府機構位置圖¹⁰¹

101 總督府與(偽)縣署之位置,可參 D'Arcy-Brown, *Chusan*, ix, 77; (清)史致馴等,《定海廳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一年〔1902〕刻本),卷3,頁2-3;〈定海縣全圖(“A Map of Tinghae Heën, in Ningpo Foo”)〉(倫敦:大英圖書館藏:004985860,約1800-1843);陳訓正、馬瀛,《定海縣志》第1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以上地圖均已獲得大英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複製許可。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仇廷模，《古今韻表新編四卷後一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219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 清·王之春，《國朝柔遠記》，長沙：嶽麓書社，2010。
- 清·史致馴等，《定海廳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一年（1902）刻本。
- 清·吳善述，《二十三母土音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四年（1878）四明黃祥黼補不足齋刻本。
- 清·高靜亭纂輯，（英）羅伯聃（Robert Thom）譯述，《正音撮要（上卷）》，寧波：寧波華花聖經書房，1846。
- 清·嵇曾筠等監修，清·沈翼機等編纂，《浙江通志（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2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佚名，〈定海縣全圖（“A Map of Tinghae Heën, in Ningpo Foo”）〉，倫敦：大英圖書館藏：004985860，約1800-1843。
- （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寧波：寧郡東壁齋刻；舟山：定海舟山南門外太保廟刊，1846。
- （英）托馬斯·米爾納（Thomas Milner）著，（英）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編譯，《大英國志》，上海：墨海書院，1856。
- （英）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著，葉篤義譯 1963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北京：商務印書館。
- （美）睦禮遜（William T. Morrison），《字語彙解：羅馬字係寧波土話》，上海：美華書館，1876。
- （美）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拾級大成》，澳門：香山書院，1842。
- （美）禱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地球說畧》，寧波：華花聖經書房，1856。
- （英）羅伯聃（Robert Thom），《華英通用雜話（上卷）》，廣州：出版社不詳，1843。

二、近人論著

- （日）大木康著，周保雄譯 2020 《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 1943 《國語辭典》，上海：商務印書館。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1992 《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王汝良 2017 〈「阿三」考〉，《東方論壇》2017.4(2017.8): 87-92。
- 王宏志 2020 〈生榮死哀：英國第一任寧波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的去世及有關其撫卹安排的討論〉，《或問》37(2020): 13。
- 王爾敏 1975 《中西文獻西譯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王毅 2005 《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日）平田直子 2005 〈《古今韻表新編》的音系〉，收入上海市語文學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合編，《吳語研究：第三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163-170。
- 田力 2012 「寧波長老會寧波差會在浙東地區早期活動研究（1844-1868）」，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論文。
- 田力 2021 《早期中英關係史：以浙江為中心的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田力 2021 〈《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所反映的寧波文化〉，《寧波晚報》2021.1.17，A07 版。
- 李小凡、項夢冰 2009 《漢語方言學基礎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汪化雲 2013 〈「垃圾」的讀音〉，《語言研究》33.2(2013.12): 92-94。
- （英）貝利（C. A. Bayly）著，段金生、蔣正虎譯 2015 《新編劍橋印度史：印度社會與英帝國的形成》，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邵義 2010 《過去的錢值多少錢：細讀 19 世紀北京人、巴黎人、倫敦人的經濟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胡方 2001 〈試論百年來寧波聲母系統的演變〉，《語言研究》2001.3(2001.9): 65-68。
- 孫廣平 2013 「晚清英語教科書發展考述」，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論文。
- 徐春偉 2017 〈《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英軍占領舟山的書證〉，「澎湃新聞·翻書黨」網站，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07893（2022.9.18 上網檢索）。
- 徐通鏞 1993 《徐通鏞自選集》，鄭州：大象出版社。
- 袁丹 2015 〈從傳教士文獻和現代方言再論百年來寧波方言的聲母系統的演變〉，《東方語言學》2015.1(2015.6): 85-101。

- (美)馬士(H. B. Morse)著,區宗華譯,朴樹惠校,章文欽校注 2016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德)馬克思(K. Marx)、(德)恩格斯(F. Engels)著,李季譯 1957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1844-1853年)》,北京:三聯書店。
- 崔山佳 2007 《寧波方言詞語考釋》,成都:巴蜀書社。
- 張凱 2021 〈《二十三母土音表》及其反映的200年前的寧波方音〉,《語言學論叢》2021.1(2021.6): 154-170。
- 曹炳章輯 1936 《中國醫學大成總目提要》,上海:大東書局。
- 郭紅 2008 〈第一本寧波方言英漢詞彙集——《英華仙尼四雜字文》〉,《或問》15(2008): 21-28。
- 陳忠敏 2018 〈吳語、江淮官話的層次分類——從古從邪崇船禪諸聲母的讀音層次為依據〉,《漢學研究》36.3(2018.9): 295-317。
- 陳訓正、馬瀛 1924 《定海縣志》,上海:定海旅滬同鄉會;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
- 陳璇 2020 〈《英華仙尼四雜字文》中近代舟山地域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37.1(2020.2): 32-37。
- 游汝杰 2002 《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 游汝杰 2016 《方言接觸論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游汝杰 2021 《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增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游博清 2017 《經營管理與商業競爭力:1786-1816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臺北:元華文創公司。
- 湯珍珠、陳忠敏、吳新賢編纂 1997 《寧波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程美寶 2021 《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葉靈鳳 2020 《葉靈鳳日記·上1943-1967》,香港:三聯書店。
- 寧波市檔案館、鎮海區檔案館 2022 《寧波方言文獻集成: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英話注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 趙力 2018 〈「外邦人的唇舌」: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的寧波口語學習(1844-1911)〉,《清史研究》2018.3(2018.6): 50-61。

- 劉永華 2017 〈清代民眾識字問題的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7.2(2017.6): 96-110。
- (美) 衛三畏 (S. Wells Williams) 著，陳俱譯 2005 《中國總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聶建民、李琦 1994 《漢語方言研究文獻目錄》，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顏慶餘 2021 〈作者意圖與文本考證學〉，《文藝評論》2021.5(2021.10): 11-18。
- 蘇 精 2014 《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蘇 精 2017 〈中西印刷術交會中的誤會〉，《文匯學人》2017.4.21: 13-14。
- “A Telugu-English Dictionary: Charles Philip Brown (1798-1884).” Digital Dictionaries of South Asia. Digital South Asia Libra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pdated October 2023, <https://dsal.uchicago.edu/dictionaries/brown/> (accessed October 2022).
- “About Us.” Government Museum. Department of Museums, Egmore, Chennai, Tamil Nadu. <https://www.govtmuseumchennai.org/museum/static.jsp> (accessed October 1, 2022).
- Bank of England. “Inflation calculator.” Updated May 22, 2024,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monetary-policy/inflation/inflation-calculator> (accessed April 28, 2023).
- “Births, Marriages, and Deaths.” In *Colburn's United Service Magazine and Naval and Military Journal*. Part 2 (London, 1843): 318-20.
- Bordo, Micheal, and Angela Redish. “Putting the ‘System’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 *Money i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Middle Ages to Bretton Woods*, edited by David Fox and Wolfgang Ernst, 595-61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Boulger, Demetrius, ed. “The First English Settlement in Chusan.” *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3 (1887): 292-330.
- “Brevet.” *The London Gazette: The Appointed Organ for All Announcements of the Executive*, June 20, 1854, 1939-45.
- Brown, Charles Philip. *A Telugu-English Dictionary: New ed., thoroughly rev. and brought up to date*. 2nd ed. Madras, 1903.
- Campbell, Alexander Duncan. *A Grammar of the Telooogo Language, Commonly Termed the Gentoo, Peculiar to the Hindoos Inhabiting the North Eastern Provinces of the Indian Peninsula*. Madras, 1816.

Catalogue of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Government Central Museum, Madras. Madras, 1856.

“Chinese Books.” In *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Books in the Public Library of the Government Central Museum, Madras. 1879-1881*, 96. Madras, 1881.

Clark, F. *The East-India Register and Directory, for 1839*. London, 1839.

Colburn's United Service Magazine and Naval and Military Journal. Part 1 (London, 1843).

Cordier, Henri.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Vol. 1. Paris, 1878.

D'Ambrosio, Rebecca. “Consider the Cover: Conserving a Chinese Book.” Collection Care blog. British Library. Updated April 9, 2019, <https://blogs.bl.uk/collectioncare/2019/04/consider-the-cover-conserving-a-chinese-book.html> (accessed December 6, 2022).

D'Arcy-Brown, Liam. *Chusan: The Forgotten Story of Britain's First Chinese Island*. Kenilworth, UK: Brandram, 2012.

“Departures.”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April 7, 1842, 12.

Edvinsson, Rodney. “Historical Currency Converter.” Historicalstatistics.org. Updated January 10, 2016, <https://www.historicalstatistics.org/Currencyconverter.html> (accessed March 20, 2023).

“Extracts from a Letter of Mr. Day.”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17 (1837): 295-302.

Fortune, Robert.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Including a Visit to the Tea, Silk, and Cotton Countries; with an Account of the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of the Chinese, New Plants, Etc*. London, 1847.

Harrassowitz, Otto. *Antiquarischer Catalog* 62 (1880).

Karttunen, Klaus. “CAMPBELL, Alexander Duncan.” Persons of Indian Studies by Prof. Dr. Klaus Karttunen. Who Was Who of Indian Studies. Updated April 2024, <https://whowaswho-indology.info/1161/campbell-alexander-duncan/> (accessed October 12, 2022).

“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Caton, Macao, Hongkong, Amoy, Fuchau, Ningpo, and Shangha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4 (1845): 3-19.

- Loomis, A. W. *Scenes in Chusan, or Missionary Labours by the Way*. Philadelphia, 1857.
- Marshall, Heather. "From West to East: Conservation of the Chinese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ollection Care blog. British Library. Updated October 17, 2016, <https://blogs.bl.uk/collectioncare/2016/10/from-west-to-east-conservation-of-the-chinese-novel-dream-of-the-red-chamber.html> (accessed December 6, 2022).
- Mohl, Jules von. "Tableau des progrès faits dans l'étude des langues et des histoires de l'Orient, pendant les années 1848." *Annales de philosophie chrétienne* 119 (November 1849): 325-37.
- Möllendorff, Paul Georg von, and Otto Franz von Möllendorff. *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Being A List of Work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China*. Görlitz, Germany, 1876.
- Nield, Robert. *China's Foreign Places: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Treaty Port Era, 1840-194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 "Official Gazette: War Office." *Allen's Indian Mail, and Register of Intelligence for British and Foreign India, China, & All Parts of the East*, March 31, 1862, 239-40.
- Pauthier, G. "Catalogue d'ouvrages Européens, pour la plupart raes et curieux, imprimés dans l'Empire Chinois." *Revue orientale et américaine*, nouvelle série, 2 (1878): 49-62.
-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August, 1847."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6, no. 2 (1847): 987-89.
- Quaritch, Bernard. *A New Catalogue of English Books; Followed by the General Library of the Late Jesse Watts-Russell, Esq., of Ilam Hall, Staffordshire*. London, 1874.
- Rao, Velcheru Narayana. "Print and Prose: Pandits, *Karanams*, and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Telugu." In *India's Literary History: Essays o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Stuart H. Blackburn and Vasudha Dalmia, 146-66.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4.
- Richardson, Charles. *A New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1844.
- Sloth, trans. *Wang Keaou Lwan Pih Nëen Chang Hăn, or the Lasting Resentment of Miss Keaou Lwan Wang, a Chinese Tale: Founded on Fact*. Canton, 1839.
- Société Orientale de France. "Quelques ports de la Chine (1)." *Revue de l'Orient: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orientale* 7 (1845): 201-3.

Staunton, George [Thomas].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1797.

Staunton, George Thomas. *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1849.

The Army List, for August, 1846. London: War Office, 1846.

Trübner & Co. *Trübner’s Catalogue of Dictionaries and Grammars of the Principal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the World*. London: Trübner, 1882.

Whitworth, George Clifford. *An Anglo-Indian Dictionary: A Glossary of Indian Terms Used in English, and of Such English or Other Non-Indian Terms as Have Obtained Special Meanings in India*. London, 1885.

Wilson, Horace Hayman. *A Glossary of Judicial and Revenue Terms: And of Useful Words Occurring in Offici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1855.

A Tri-Lingual Language Vocabulary Book: An Investigation of *Ying Hua xiannihuasi zaziwen* and a Reevaluation of Its Value

Wang Ze-wei*

Abstract

Ying Hua xiannihuasi zaziwen 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 (*A Manual for Youth and Students, or Chinese Vocabulary and Dialogues, Containing an Easy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Ningpo Dialect*), published during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Zhoushan, stands as a broad and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book. Prior to this research, only a few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visual presentation of the work, primarily exploring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pioneering value. Nevertheless, a substantial exploration into its phonetic system, arguably the book's most academically invaluable feature, has been conspicuously absent, resulting in sustained neglect of its research potential to the present day. As the earliest English-language textbook in the Wu Chinese region, this work pioneered the system of employing Telugu to annotate the Ningbo dialect and has unique value in record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Ningbo dialect during the First Opium War. Hence, this study examines not only its compilation and book history but also transcribes select portions of the Telugu script. The objective is to illuminate the book's pivotal role in validating the phonetic evolution of the Ningbo dialect from the modern era onwards and in filling notable gaps in our comprehension of this 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academic value of *Ying Hua xiannihuasi zaziwen* should be reassessed. Its profound significance and contribution in the history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merit recognition and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Keywords: *Ying Hua xiannihuasi zaziwen* 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 Chusan, Zhoushan, Ningbo dialect, Telugu, English-language textbook

* Wang Ze-wei,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